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212\_19(2).0005

## 巡查大人的「理蕃」烏托邦： 吉村敏的臺灣小說〈山路〉<sup>§</sup>

### The Japanese Authority's Utopia of Aborigine Control: Satoshi Yoshimura's Taiwan Novel “Mountain Road”

劉淑如

Shu-ju LIU \*

**關鍵詞：**「理蕃」、吉村敏、〈山路〉、莎韻、志願兵制度

**Keywords:** Aborigine Control Policy, Satoshi Yoshimura, “Mountain Road”,  
Sayun, Imperial Army Special Volunteer System.

---

2021年7月26日收稿，2022年4月5日修訂完成，2022年9月22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令和二年度（2020）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日本研究フェローシップ補助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致謝。赴日研究期間並蒙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院映像・現代文化論研究室押野武志（Takeshi Oshino）教授及水溜真由美（Mayumi Mizutamari）教授在研究與生活上多所關照、學習院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日本語日本文學研究室中山昭彥（Akihiko Nakayama）教授不吝給予研究上的支持與鼓勵，在此一併致謝。另外，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細心指正，本文方能更臻完備。尤其本文中對於小說文本中的施恩與報恩思想之與日本文化核心的義理概念的關聯、以及對於透過日本帝國種族論述政策發展脈絡的爬梳，以彰顯小說文本中強調的日原同質性在日本治台時期的時代特殊性等反思，皆源自審查人的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 摘要

垂水千惠指出，《決戰臺灣小說集》網羅的作家多為戰前臺灣具代表性之作家，但戰後有關吉村敏作家作品研究卻與此不相稱。本文首先透過吉村敏在臺活動及其文學歷程進行初探，結果顯示其任職機構皆屬官方，其作品多具國策協力面向。小說〈山路〉發表於太平洋戰爭前夜，當時旨在確立高度國防國家體制以邁向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皇民奉公會」剛在臺成立，莎韻「美談」傳遍臺灣，總督府也已發佈臺灣將於隔年起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的消息，而原住民亦適用之。〈山路〉以「廣義理蕃人」日警之妻的葬禮為舞台，透過日原親密關係與同質化敘事、「聖戰」當前無個我的書寫策略，提出時局所需的「蕃界人」形象；並透過原民爭取承擔受徵召日警嬰兒養育責任之敘事，影射「志願」協助日人的原民形象。作者流露對日人的人本關懷，卻隱蔽原民的困境而代以原民對日人的恩惠歌頌與報恩及「志願」敘事。然而在作者將具有「非本意性」的日本的「義理」「報恩」意識強加諸原民的前提下，親密關係終有破綻，「內臺融合」僅是烏托邦，「志願」背景更絕非僅因日本教化的成功。據此，〈山路〉的人本關懷不僅有源自種族主義的侷限，其殖民地主義的橫暴也更形強化，小說因此可回收到吉村敏的國策協力文學系譜。

## Abstract

Tarumi Chie noted that the authors included in the *Anthology of Taiwan War Fiction* were for the most part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war period, but postwar research on the works of Satoshi Yoshimura does not support this asser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Yoshimura's activities and literary work in Taiwan. I show that Yoshimura worked only with official institutions and that most of his writings were closely aligned with national policies. The novel *Mountain Road* was published on the eve of the Pacific War, when the Kominhokokai (Imperial Subject Service Association), which aimed to establish a high-level national defense system and move to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ast Asian order, had just been established in Taiwan. At that time, propaganda about the "Sayun Incident" was sweeping across Taiwan.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announced that the Imperial Army Special Volunteer System would be implemented the following year and that the system would apply to aboriginal people. The story of *Mountain Road* is centered around the funeral of a Japanese police officer's wife. Through narratives depicting assimilation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and aboriginal people as well as a writing strategy that erased the individual in the face of a "holy war," the novel presents an idealized image of colonizer-colonized relations that suited the needs of the regime at that time. Also, the narrative of aboriginal people seeking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bringing up the children of Japanese police officers reinforces the image that aboriginal people voluntarily assisted the Japanese. The author reveals a humanistic concern for the Japanese, but conceals the plight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Instead, the aboriginal quandary is replaced with paeans to the kindness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volunteering" narrative. However, the premise which the author uses to impose a sense of "righteousness" on the Japanese and the "repayment of kindness" on the aboriginal people eventually breaks down, inadvertently revealing that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Taiwanese"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utopian fiction and "volunteering" was not successfully engendered by Japanese indoctrination. In this sense, not only do the humanistic concerns of *Mountain Road* have their origins in racism, but they also reinforce colonialist brutality. The work can therefore be placed squarely in Yoshimura's literary genealogy of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 壹、序言

葉石濤主張臺灣新文學運動始於《臺灣青年》（1920）的刊行，直至二戰結束。<sup>1</sup>葉將這廿五年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劃分為三個時期，其中第三期自中日戰爭爆發（1937）之後，到日本戰敗為止。葉引用日本評論家的說法，稱此一階段的臺灣文學為「決戰下的臺灣文學」，並指出：

這期間的臺灣作家面對的是戰爭帶來的臺灣總督的言論壓迫和皇民化運動的摧殘。中文作家已經消聲匿跡，以前用日文寫作的臺灣作家也很少參加文學活動，代而出現的是一群新面孔的日文作家。我們可以看到一次文學世代的更迭。於是獲得殖民政府支持的在臺日人作家強力地主張，「外地文學」論，把臺灣新文學看作日本文學的附庸。日人作家積極組織文藝團體，協助殖民政府推動皇民化運動，歌頌「大東亞共榮圈」和「八紘一宇」的荒謬侵略思想。<sup>2</sup>

本文將考察的由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作家吉村敏（生卒年不詳）發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的小說〈山路〉（1941），<sup>3</sup>正是其中一個典型。目前有關吉村敏作家作品研究極少，相關考察多是在探討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情報課利用臺灣文學奉公會組織，動員島內知名臺日文學家前往生產現場以筆奉公的成果《決戰臺灣小說集 乾之卷》（1944）、《決戰臺灣小說集 坤之卷》（1945）時觸及。其中以中島利郎〈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臺灣小說集 乾之卷／坤之卷》〉的刊行——從「臺灣決戰文學會議」到『決戰臺灣小說集』〉（〈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灣小說集 乾之卷／坤之卷』の刊行——「台湾決戰文学

1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年），頁19。

2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悲情》，頁21-22。

3 吉村敏：〈山路〉，初出《台灣警察時報》312號（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41年），頁51-57。吉村敏：〈山路（二）〉，初出《台灣警察時報》313號（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41年），頁68-75。戰後收入星名宏修·中島利郎（編）：《臺灣純文學集二》（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頁175-187。本文參考後者。另外，本文中有關〈山路〉的引文與吉村敏的作品名稱皆為筆者自譯。

會議」から『決戦台湾小説集』へ〉，2004）為代表。<sup>4</sup>中島透過比較《決戰臺灣小説集 乾之卷》收錄的吉村敏〈築城の抄〉（〈築城の抄〉，1944）與《決戰臺灣小説集 坤之卷》收錄的楊達〈増産の背後〉（〈増産の蔭に〉，1945）指出，對照楊達對於底層勞工的精準觀察與對於知識人乃至日本的臺灣統治的批判姿態，吉村敏缺乏對臺灣勞工的了解，也「無法深刻描繪出臺灣人」。<sup>5</sup>另外，從戲曲角度出發的吉村敏研究，同樣以中島利郎針對日治時期臺灣戲曲・腳本的〈解説〉（2003）為代表。<sup>6</sup>中島該解說旨在介紹吉村的《護郷兵》（1943）與《一個矢弾》（《一つの矢弾》，1944）的主題與出版背景，文中除指出前者以卑南社原住民無條件歡迎日本統治的情節設定偏離臺灣觀眾意識、後者具皇民化要素外，並未就作家作品進行深入探討。最後，從臺南文學的角度論及吉村敏者，以莊永清〈日治時代臺南新文學史料的歷史考察〉（2012）為代表。莊指出吉村敏等「臺南日治時代的新文學作家在臺灣文學史上扮演一定的角色，此角色同時具有地方性、全島性乃至世界性（東亞性）的文學意義」。<sup>7</sup>但莊並未闡述其由緒，也同樣未就吉村敏作家作品進行考察。

戰後有關吉村敏小説的探討始自山中恒《甦醒吧！兒童讀物》（《兒童讀物よ、よみがえれ》，1978）。<sup>8</sup>山中是在考察戰前日本兒童讀物的脈絡下提及吉村敏的臺灣小説〈柚子樹〉（〈ザボンの木〉，1944），<sup>9</sup>並以結果論影射該小説的軍國主義色彩與吉村敏的國策協力作家定位。<sup>10</sup>但山中並未深入考察該作，也同樣未就吉村敏作家作品歷程進行爬梳。其次有

4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序説・台湾総督府情報課編『決戦台湾小説集 乾之卷／坤之卷』の刊行——「台湾決戦文学會議」から『決戦台湾小説集』へ》（東京：緑蔭書房，2004年），頁204-233。

5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序説》，頁230。

6 中島利郎：〈解説〉，中島利郎（編著）：《台湾戯曲・脚本集四》（東京：緑蔭書房，2003年），頁393-398。

7 莊永清：〈日治時代臺南新文學史料的歷史考察〉，收入葉瓊霞等：《文學臺南——臺南文學的特展圖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141。

8 山中恒：《兒童讀物よ、よみがえれ》（東京：晶文社，1978年），頁64-70。中譯名出自筆者。

9 吉村敏：〈ザボンの木〉，《少国民文化》十二月号（東京：財団法人日本少国民文化協會，1944年），頁24-27。

10 山中恒：《兒童讀物よ、よみがえれ》，頁64-65、69。

關〈山路〉的討論參照星名宏修〈《台灣純文學集二》日本人作家作品解說〉（2002）、<sup>11</sup>林慧君〈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的原住民形象〉（2012）。<sup>12</sup>前者從日人作家的「蕃人」視線、後者從日治時期在臺日人小說中的臺灣原住民（以下簡稱原住民）形象的脈絡觸及。二者都留意到〈山路〉中日原親密關係的殖民政治性，但皆未深入探討小說而僅概述性提及。綜上可知，目前有關吉村敏的作家作品論述極待充實。尤其雖有論者留意到吉村敏部分作品的不接臺灣地氣與國策協力面向，但由於缺乏對吉村敏作品的系統性爬梳，導致有關吉村敏作家定位的立論缺乏支撐。另外，有關〈山路〉的討論僅屬側面考察，無法具體呈現作品與歷史社會脈絡的連動及殖民政治意涵，也無法具體彰顯其暴力性。

垂水千惠指出，《決戰臺灣小說集》網羅的作家大多是戰前臺灣具代表性之作家。<sup>13</sup>然而，戰後至今有關吉村敏作家作品檢討的匱乏，卻與此不相稱。〈山路〉發表時，中日戰爭已歷時四年餘，太平洋戰爭也一觸即發。則，作者具體的書寫策略為何？尤其當時旨在確立高度國防國家體制以邁向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皇民奉公會」剛在臺成立，皇民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總督府當局傾力擴大宣揚莎韻「美談」，總督府也已發佈臺灣將於隔年開始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的消息，而原住民亦適用之。職是，本文將先就吉村敏的在臺活動及文學歷程進行初探，進而從作者對於日原親密關係的書寫、成功的「理蕃」政策的表象、小我困境與「聖戰」大業牴觸的因應、大東亞戰爭下的「恩惠」歌頌與「報恩」敘事等面向，思考〈山路〉的時代性意涵及其在吉村敏臺灣文學系譜中的位置。透過吉村敏在臺活動與文學歷程的初探，不僅可彌補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研究之缺口；如後所述，吉村敏曾以報導班員身份前往菲律賓（以下除作品名稱外，簡稱菲），與日本南方徵用作家有交會，故相關考察亦將有助於窺探南方徵用文學與臺灣文學之間的關聯性。另外，透過以太平洋戰

11 星名宏修：〈《台灣純文學集二》日本人作家作品解說〉，《台灣純文學集二》（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頁489-498。

12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的原住民形象〉，《國文天地》28卷3期（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2012年8月），頁58-64。

13 垂水千惠：〈あとがき〉，收入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台湾の「大東亞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311-312。

爭爆發前後的「蕃界」為舞台的〈山路〉的專論，不僅可深化對於四〇年代在臺日人作家的原住民書寫樣貌之理解，就〈山路〉所處理的「理蕃」成效與所影射的原住民「志願」議題而言，前者可促進對原住民文化在皇民化政策下的變遷軌跡、後者則可增進對日人如何製造原住民「志願」言說此一脈絡之理解。

## 貳、吉村敏在臺活動及文學歷程初探

在介紹吉村敏之前，本文將先就其可能為總督府職員錄中長達十二年以訓導身份隸屬於臺南州公・小學校的吉村守一點進行考察。根據該系統，吉村守曾任職於臺南州明治公學校（1929）、南門尋常小學校（1930-1931）、蒜頭公學校（1934）、朴子尋常高等小學校（1935-1936）及花園尋常小學校（1937-1940）。<sup>14</sup>而對照本文附件「吉村敏作品年表」中的作品內載有作者所屬機構及刊登時間可知，其經歷皆與吉村守的重疊。<sup>15</sup>但前述職員錄中並無吉村敏。唯吉村敏亦有十二年教員之經歷，<sup>16</sup>期間發表的作品也多以公・小學校為舞台。<sup>17</sup>另，筆者管見戰前吉村守的作品有二，其一為詩〈某一天〉（〈思ひ出すこと〉，1936），為「國語」（Kokugo）（以下簡稱「國語」）普及之作品。而吉村敏亦曾創作相關歌詞〈五十音〉（〈アイウエオ〉，1933）。<sup>18</sup>其二為與堀川安市共著之〈關於臺灣的志願兵制〉（〈臺灣の志願兵制について〉，1941），旨趣為替「志願兵」制度即將在臺實施追本溯源，強調昔日「護鄉兵」等即為之。<sup>19</sup>而吉村敏亦著有《護鄉兵》（1943），旨趣亦與之同。<sup>20</sup>加以吉村敏與堀川安

14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央研究院臺史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15 例如該表序號2〈台灣農村公學校児童の生活に〉顯示吉村敏來自臺南州東石郡蒜頭公學校；序號3〈夏を小学生と行く〉、6〈夏・水於与支〉、7〈牛〉顯示吉村敏隸屬於「朴小」。「吉村敏作品年表」（以下簡稱「年表」）請參照本文頁188-199。

16 吉村敏：〈子供は総て〉，「年表」序號14，頁81。

17 參照「年表」序號2-4,7,9-10,14-15,18之「主題／要旨」欄。

18 參照「年表」序號1、5。

19 參照「年表」序號19，頁14。

20 吉村敏：《護鄉兵：〈はしがき〉》，參照「年表」序號46（單行本），頁5。

市亦有交集、<sup>21</sup>吉村敏與吉村守都曾於文章中觸及菲樂器「Bunkaka」、<sup>22</sup>都與和歌山有淵源、<sup>23</sup>都曾與作曲家古關裕而搭配作詞。<sup>24</sup>據此可推論，吉村守與吉村敏極可能為同一人。<sup>25</sup>

承上，教師時期的吉村敏，課餘頗積極響應當局「國語」普及政策，相關歌詞創作並數度入選臺灣公學校唱歌。<sup>26</sup>一九四一年春，吉村敏北上進入臺北放送局（JFAK），<sup>27</sup>為臺灣文學奉公會劇文學部成員，<sup>28</sup>此一時期與臺籍作家楊雲萍（同為《決戰臺灣小說集》的作者之一）亦有公私往來。<sup>29</sup>縱觀吉村敏的臺灣文學，文類包括詩、歌詞、小說、隨筆及戲劇等。內容則多為反映或唱和時局如〈千人針〉（1938）、〈黃色大理花〉（〈黃色なダリヤ〉，1939）、〈軍事書簡〉（〈軍事郵便〉）〈小春日和〉（以上 1942）等。另亦有鼓吹大東亞意識的作品群如以放送局報導班員身份渡菲期間的見聞作〈紅豆和煎餅〉（〈モンゴとアパー〉）〈追憶馬尼拉〉（〈マニラに憶ふ〉）〈菲律賓人之我見〉（〈見た比律賓人〉）（以上 1942）、〈比島遊記 茉莉花〉（〈比島遊記 サンパギータ〉）〈建設之譜〉（〈建設の譜〉）〈敵愾心〉（以上 1943）等。<sup>30</sup>

21 吉村敏：〈比島遊記 サンパギータ〉，參照「年表」序號 32，頁 113。

22 吉村守：〈庁内隨記（4）〉，參照「年表」序號 63，頁 2。吉村敏：〈ヒリッピン古樂器圖誌(3)〉，參照「年表」序號 34，頁 29。

23 吉村敏兒時移居和歌山。吉村敏：〈隨想『兒童街』〉，參照「年表」序號 12，頁 9。戰後初期的吉村守的動向也與該地有關。參照前揭注 22 吉村守：〈庁内隨記（4）〉，頁 2；吉村守（編）：《昭和紀伊洪浪の記》，「年表」序號 64，頁 8-10、71-78。

24 戰後由吉村守作詞、古關裕而作曲（藤山一郎唱）見〈国民歌：海は生きている——海の歌——〉（コロンビア，1952 年 7 月）；戰前由吉村敏作詞、古關裕而作曲見〈アイウエオ〉，「年表」序號 1，頁 115。

25 從住址等角度推敲二者為同一人的考察參照網頁：

<http://kurihon.seesaa.net/article/475499946.html>

26 吉村敏：〈台灣農村公學校兒童的生活〉，「年表」序號 2，頁 60。

27 吉村敏：〈悲運の鄭氏〉，「年表」序號 17，頁 102。吉村敏曾提到學校生活令他憶起與小五生同齡的亡兒，失去愛兒的痛也令他欲逃離傷心地。吉村敏：〈子供は総て〉，頁 79-80。巧的是這篇隨筆也是吉村敏北上前最後發表的作品。

28 吉村敏：〈親馬鹿〉，「年表」序號 16，頁 74。

29 中研院台史所藏：〈吉村敏所寄信函〉，1944 年 6 月 24 日、1944 年 6 月 29 日，《楊雲萍文書》。〈吉村敏所寄明信片〉，1944 年 4 月 18 日、5 月 3 日、7 月 29 日，《楊雲萍文書》。

30 吉村敏於 1942 年 2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待在馬尼拉。參照吉村敏：〈見た比律賓人〉，



另外，與南進及「志願兵」主題相關的作品群，除了前述〈關於臺灣的志願兵制〉外，還有〈山路〉（1941）、〈光榮歸來〉（〈光榮に帰る〉，1942）、〈山中母親訪記：拜訪高砂義勇隊之母〉（〈山の母を訪ふ記：高砂義勇隊の母を訪ねて〉，1942）、〈敗鏡尼〉《護郷兵》〈床母〉（以上 1943）、〈堅實的後盾：拜訪山中勇士遺族〉（〈たしかな裏づけ：山の勇士の遺族を訪ねて〉）〈宣誓詩 臺灣兵制史邁向強者之路〉（〈宣誓詩 台湾兵制史つはものへの途〉）〈農夫志願〉（〈百姓志願〉）〈柚子樹〉（〈ザボンの木〉）（以上 1944）。另外，〈都是好孩子〉（〈みんなよい子〉）〈悲運的鄭氏〉（〈悲運の鄭氏〉）（以上 1941）則旨在強調臺日親密關係並合理化日本治臺與南進。另有報導「產業戰士」的作品群如〈金山拾遺〉（〈かな山拾ひがき〉）〈劇作家，奮起吧！〉（〈劇作家よともに〉）〈從築城現場歸來〉（〈築城現地より帰って〉）〈清純〉〈築城之抄〉（〈築城の抄〉）《一顆飛彈》（《一つの矢弾》）以及「街頭小說」（「辻小説」）群如〈毛髮再生〉（〈傷の毛〉）〈某個矛盾〉（〈ある矛盾〉）（以上 1944）等。

綜上可知，戰前吉村敏在臺任職機構皆屬官方；其作品也大多具有強烈的國策協力色彩。〈山路〉發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以及特別志願兵制度即將在臺實施，原住民也被納入此制度內的消息發佈之後。在此之前，吉村敏（守）才與堀川安市發表旨在為志願兵制度歷史脈絡化的〈關於臺灣的志願兵制度〉。因此，從作品時間看來，〈山路〉即便不是受到前者的啟發，也是在作者關心的原住民「志願」及日原民族關係的一直線上，與國策緊密連動。尤其總督府在霧社事件後加強對原住民的教化；在中日戰爭後也一面灌輸皇民化思想，一面打壓原住民文化。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對象之納入原住民，即意味過去保持「蕃地」靜謐的「理蕃」策略，將轉而朝向培養原住民成為重要兵源之一的方向發展。在此一大時代背景下，〈山路〉具體如何回應之？

---

《台湾警察時報》324号（台北：台湾警察協會，1942年11月），頁38。

### 參、臺灣小說〈山路〉： 偏鄉部落的火葬現場：「蕃界」親密關係的展演舞臺

〈山路〉的舞臺為臺灣某原住民部落，故事從住在蕃社、負責「蕃社」治安與「蕃童」教育的日本警察山田新吾之妻小枝子的火葬場面做為開端。接著作者為圍觀葬禮的「蕃界」生活主體即原住民、日警等設定的有著同樣悲傷表情的安排，乃為「蕃地」靜謐、「蕃情」穩固、「日臺融合」的大敘事揭開序幕。此從火葬結束後，場面逐漸恢復平靜的「蕃界人」的互動書寫中，便可獲得驗證。小說寫道，火葬結束後，眾人聚集在山田的宿舍，山田向眾人致意後，請眾人返家休息，隔日再前來協助撿骨，但頭目與「蕃丁」卻堅持留下守靈。對於原住民此舉，作者以「純粹的心意」稱之。接著作者更藉由小枝子亡骸採取火葬的決議起初不為「蕃人」所接受，但在山田告知遺骨將寄交給小枝子「內地」的親人後，「蕃人」對日人處境充滿同情與理解的回應，開始鋪排「日人施恩」／「蕃人報恩」的小說的主張。

內地人真可憐，為了咱們，大老遠從內地來到這麼不方便的地方生活。要是像山田桑的太太那樣不幸過世的話，也只能燒一燒送回內地。<sup>31</sup>

關於小枝子之於「蕃人」之恩，作者則透過當晚聚集在山田家的「蕃婦」鄰人與小枝子生前的親密關係書寫，娓娓道出。原來，「蕃婦」都曾接受過小枝子在裁縫、料理、日式禮儀上的指導。作者並稱，「小枝子正因充份理解山田的工作，才能無怨無悔地在此偏鄉度過大喜之日。」這也是何以她會受到蕃社所有女性的愛戴，並被孩子們視為母親之故。<sup>32</sup>另外，〈山路〉中兩名「蕃婦」主角之一、早小枝子兩個月生產的阿蜜露，其子 Takeo（タケオ）是由小枝子所命名、Takeo 身上穿的和服也是由小枝子親手所縫製。反之，小枝子生產時的衣著乃由「蕃婦」準備、產後罹病也是由「蕃婦」照顧。此種親密關係更延續到小枝子死後，此即阿蜜露充當小

31 吉村敏：〈山路〉，頁 176。

32 吉村敏：〈山路〉，頁 176。

枝子之子的乳母的情節安排。

而山田可說就是「親切」二字的化身。相較之下，原住民則顯得相當的克制。例如在小枝子的遺體火化完畢後，山田向原住民致意，請其返家休息，但眾人皆不從而寧可睡在山田家的院子裡。在守夜的隔日，山田邀請眾人進入宿舍補眠，但眾人也只坐在石階上或靠在樹上靜靜守著火勢。類似的書寫於該晚場景中再度出現。當晚隣近「蕃社」駐在所的同事石原前來致意，言談間石原拋出嬰孩照顧問題，小說便著墨起小枝子從產前到分娩、再到罹病去世的由緒。原來小枝子替丈夫設想而堅持與「蕃婦」一同留在山中待產，不幸某日在宿舍跌倒而早產，產後又因罹患產褥熱而去世。接著小說回到當晚場景，令山田再度展現親切，邀眾人入屋。但眾人仍婉拒，石原於是以嬰孩會感冒為由，再度力邀，眾人這才從，但也只是待在玄關而已。<sup>33</sup>小說還寫道，當晚阿蜜露先為山田的嬰孩餵完奶後，才到屋外從巴黛手中接過自己的嬰孩餵奶。山田見狀請其入內休息，遭她婉拒。直到山田與石原不斷力勸，她才進屋。如是，作者不厭其煩地反覆彰顯山田的親切與原住民的自制。

山田的親切，其實是回應〈山路〉書寫的年代，總督府當局對全台警察之要求。親切的觀念做為「理蕃」要領之一，可追溯到日治初期。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廿六日公布的「訓示」中，明示治理「生蕃」之方針為「綏撫」。其背景除了避免與原住民發生衝突、防範「漢」「蕃」聯合抗日等軍事考量外，「亦有積極的促進山地開發的經濟用意。」<sup>34</sup>在一八九五年十月訓令第十號警察官吏服務須知第九條中，也明定「應親切對待山地之原住民，並加以懇切恤愛。」<sup>35</sup>此亦與日人掠奪山林資源的意圖相關。尤其，樟腦僅在臺日生產，獨占世界市場，日人視其為「最值得經營之事業」，但也認為「原住民視之為己有」，是而考量

33 吉村敏：〈山路〉，頁177。

34 藤井志津枝：《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9年），頁2。

35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樺山總督於琉球中城灣之諭示中有關撫綏原住民之要旨〉，《日據時期原住民政志稿第一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5。

清在臺廣設撫墾局，對原住民施惠撫恤，成效良好，總督府當局便仿效清，也在臺廣設撫墾署，掌理原住民的撫育及輔導生產、山地開墾及山林與樟腦製造事項。<sup>36</sup>

隨著日人的平地統治漸上軌道及原住民抗爭頻仍，一九〇六年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後，便創設「蕃務本署」，兩度提出「理蕃事業五年計劃」，對原住民祭出強力鎮壓政策，並略施以「撫育懷柔」。<sup>37</sup>此後，「恩威並施」再度被奉為「理蕃」圭臬之一，以達到展示日本國威、開發臺灣資源之目的。<sup>38</sup>昭和初期一篇刊在《台灣警察時報》的〈警察的民眾化〉（〈警察の民衆化〉，1930）一文，也反映了當時總督府對於「親切」治台原則的重視。該文稱，欲達到官方高唱的「內台融和」「官民親和」之境，當務之急須改善警察的制服與其對民眾的用語和態度，以期警察的形象由「恐怖的大叔」轉變為「親切的大叔」。值得一提的是，該投書還獲得了該年度「新年文藝第二等」，<sup>39</sup>足見相關意見深受官方重視之一斑。

霧社事件後，日方深切體認到，欲達到真正的撫育，須相互理解、恩威並行。中日戰爭後，隨著戰爭的長期化，其內涵轉為新東亞建設，在全體總動員的局勢之下，日人認為，原住民雖為新附之民，亦為皇民，是而「必須灌輸以不惜粉身碎骨的赤誠。」且其雖「頑蒙」，卻具堅忍持久之特質，符合長期作戰之需求。因此，此時的「理蕃」要務，亦強調促進教化。<sup>40</sup>就在〈山路〉發表前，甫上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東條英機也在向內閣各省首腦發佈的初訓示內，強調「親切」的重要。在臺灣方面，警界高層

36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呈請設立撫墾署〉，〈撫墾署官制〉，《日據時期原住民政志稿第一卷》，頁9-10。

37 台灣總督府（編）：《佐久間台灣總督治績概要》（台北：台灣總督府，1915年），頁101-102。

38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總督在警察會員上之訓示〉，《日據時期原住民政志稿第四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12。

39 灰面坊：〈警察の民衆化〉，《台灣警察時報》3號（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30年），頁5。

40 理蕃の友發行所：〈長期建設と理蕃〉，《理蕃の友》85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9年），頁1。

亦向島內警察呼籲奉「親切客氣」為圭臬之必要。<sup>41</sup>值得注意的是，如後所述，〈山路〉發表時，象徵「原住民報恩」意象的「莎韻之鐘」的「美談」「被畫成圖畫、編成歌曲、寫成文章，陸續在社會上發表」，宛若「時代的寵兒」。<sup>42</sup>此不啻宣告，日本長達四十餘年的「理蕃」，已邁入「驗收」（報恩）的新階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山路〉發表前，與「大政翼贊會」屬性相同、旨在確立高度國防國家體制以邁向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皇民奉公會」甫在臺成立，而「蕃地」在自助會的營運上也遵行其旨趣，包括以國體為本義的臣道實踐、「無私奉公」等。<sup>43</sup>隨後總督府發佈臺灣將於隔年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的消息，而向來被認為不具能力的原住民亦適用之。與此連動，在後述「廣義理蕃人」對原住民的親切恩情及雙方的親密關係敘事後，〈山路〉提出了山田甫出世的男嬰（新生日本）該由誰撫養（守護）的命題。而從作者最終令原住民＝新日本人「勝出」的書寫策略可知，其意在對原住民展現託付生命（施恩、尊貴化）的信任之姿，以期收其報恩之效。亦即，〈山路〉乃旨在透過原住民「志願」承擔即將接受徵召的山田所留下的嬰兒的養育責任之敘事，影射理想的「志願（協助日人）」的原住民圖像。至此，由日警的親切／恩情與原住民的報恩所構築起的日原親密關係的殖民政治性之強烈不言而喻，而與此同時展開的，則是「理蕃」政策收效的書寫策略。

## 肆、成功的「理蕃」政策： 「蕃人」的日本化敘事與「理蕃人」的通曉「蕃語」

如前所述，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極強調「促進教化」。「理蕃大綱」不僅載明「理蕃」的目的在於「一視同仁」地讓原住民「沐浴在聖德

41 志能：〈卷頭言〉，《台灣警察時報》312号（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41年11月），頁1。

42 理蕃の友發行所：〈愛国少女サヨンの鐘〉，《理蕃の友》117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9月），頁5。

43 齋藤生：〈蕃地の皇民奉公運動〉，《理蕃の友》117号，頁1-2。

下」、強調「矯正」原住民的「弊習」、培養其「良好」習慣以使其具備「國民」思想涵養，也要求「理蕃」人的性格必須穩重，以期能正確理解、並懇切指導原住民。<sup>44</sup>一九三五年，日本舉辦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石垣警務局長在相關系列活動中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的訓示中，提到了當時臺灣「到處都設有教育所，國語政策實施普及」的現象，並援引當時原住民各族菁英齊聚吟唱「君之代」之例，宣揚日本治臺四十年的成效。<sup>45</sup>與此連動，〈山路〉也極力鋪陳原住民的日本化敘事，例如除了前述小枝子指導「蕃婦」裁縫等之外，作者也透過葬禮的書寫，再度強調小枝子是如何致力於「蕃地」的日本教化、以及此一教化最終被落實在「蕃地」所象徵的「理蕃」的成功。

具體而言，葬儀中「蕃婦」懂得以白花裝飾靈堂、站在庭院迎靈、誦經燒香、佛前供飯、行日式祭祖儀式等。<sup>46</sup>另外，巴黨在上前安慰山田時，也懂得先走到日式建築的「緣先」（檐廊邊）、接著安靜進入「座敷」（榻榻米客房）、最後關起「障子」（和式隔間拉門）。小說稱，「這也是小枝子教導的禮儀作法。」<sup>47</sup>就連在葬禮隔天的早餐中，也出現「蕃婦」準備的味增湯，小說強調，這「也是山田夫妻一手導入的。因為向來以山田家為中心，凡出入山田家者，皆被視為山田家的親人，受到款待，並受到禮儀指導。」<sup>48</sup>其次關於「國語」的書寫，〈山路〉中除了巴黨的父親與製作骨灰罈的耆老外，年輕世代如阿蜜露與巴黨二人皆熟稔「國語」。事實上，霧社事件後，總督府便將「國語」視為原住民教育的兩大重點之一；<sup>49</sup>中日戰爭後，相關普及活動更如火如荼展開。<sup>50</sup>凡此種種皆旨在強化

4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理蕃大綱〉，《理蕃概況》（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5年），頁1-2。

45 石垣警務局長：〈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会に於ける石垣警務局長訓示〉，《理蕃の友》47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5年11月），頁1。

46 吉村敏：〈山路〉，頁184-185。

47 吉村敏：〈山路〉，頁179。

48 吉村敏：〈山路〉，頁185。

49 鈴木質：〈蕃童教育の二大眼目〉，《理蕃の友》創刊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年），頁6-7。

50 如「國語普及會」等。當局亦使用皇太子臺灣行啓時贈予高砂族的寄附金利息，做為獎勵金。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高砂族の教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42年），頁15-16。

原住民的皇民意識，以使其「更加挺身、付出及貢獻，以裨益於國家總力的發揮」。<sup>51</sup>在〈山路〉中，不只原住民懂「國語」與日本文化；相對地，日本人亦會說「蕃語」並懂得欣賞其文化。前者的場景出現在前述石原以嬰孩會感冒為由而邀眾人入其宿舍時、<sup>52</sup>以及山田前往拜訪協助製作小枝子骨灰罈的原住民雕刻家耆老，向耆老問候時。<sup>53</sup>而後者則呈現在山田於耆老家等待骨灰罈完工時，作者針對山田夫妻對於原住民雕刻的瞭解、欣賞與喜愛的書寫中：

這位老人是這一帶最好的雕刻家。將自古以來獨特的雕刻文化傳承到這一帶蕃人手中的也是他。山田就是向這位男性請託幫忙製作骨灰罈的。骨灰罈外觀那注入他畢生精神的雕刻，是他用一整晚所精心刻出的成果，而山田想將小枝子生前摯愛的蕃族雕刻，當成最後的禮物送給她。<sup>54</sup>

關於小枝子平日喜愛原住民雕刻文化一點，作者也再度於山田抱著骨灰罈回到宿舍後於回應石原對骨灰罈的讚賞中，再度強調。<sup>55</sup>而上述對於山田及石原會說「蕃語」、以及兩人與小枝子皆懂得欣賞原住民雕刻文化一點，應也是作者欲呈現的「理蕃」烏托邦的另一個向度：期待「理蕃人」懂「蕃語」並理解其（符合「在來良風美俗的」<sup>56</sup>）文化。事實上，總督府早在治臺初期即鑑於「通事利用日本人與原住民之間語言不通牟利，以致往往傷害原住民之感情，影響撫育事務」，在設置撫墾署時，便計劃由署員研究「蕃語」。<sup>57</sup>爾後雖曾因「蕃通」凋零、「蕃人」懂中文者漸增，以

51 理蕃の友發行所：〈總務長官訓示（理蕃關係抜粹） 昭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於警察會議〉，《理蕃の友》114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6月），頁1。

52 吉村敏：〈山路〉，頁177。

53 吉村敏：〈山路〉，頁180。

54 吉村敏：〈山路〉，頁180。

55 吉村敏：〈山路〉，頁181。

56 台湾總督府警務局：《高砂族の教育》，頁8、109。

57 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訂定原住民語編纂方針〉，《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一卷》，頁40-41。

致「蕃語」的學習一度有被擱置的傾向，<sup>58</sup>但仍持續到昭和。<sup>59</sup>而其主要目的無非在於「蕃人操縱、蕃情查察、社會教化」、<sup>60</sup>「確保蕃地治安」並貫徹「山地生產力擴充」目標。<sup>61</sup>尤其中日戰爭以來雖然到處都有盛大的「國語」演習會，但原住民的日語程度普遍並不佳，<sup>62</sup>可見懂「蕃語」在當時的必要性，而〈山路〉也勾勒出此一理想圖像。至於〈山路〉中歌頌原住民文化之書寫，首先，骨灰罈雕刻在文本中具有原住民「報恩」意象、為實用之物，不僅不妨害皇民化運動，還符合當局對原住民教育重手工與實用的施策方針。<sup>63</sup>加以過去亦有日人倡議認為，原住民工藝能力的養成，有助其自立及「理蕃」，實為「良風美俗」，值得保留。<sup>64</sup>更重要的，此舉亦頗有尊貴化原住民之意味，尤其在「日本人」為日原共享的時代下，尊貴化原住民也有助於維持、抬升「日本人」的整體質素。

而〈山路〉中極力勾勒的原住民的日本化／同質化敘事，就日本帝國主義的種族論述與政策發展脈絡來看，顯然具有歷史特殊性。如前所言，日治初期的「理蕃」採取「綏撫」方針。其後為實現當時具國際競爭力的輸出品樟腦的原產地「蕃地」的開發目的，兒玉源太郎總督甚至表示不惜滅絕原住民。<sup>65</sup>接著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更採取幾近殺戮的「討伐」與「取締」

---

58 台北州理蕃課：〈台北州理蕃課發行之學術講習用蕃語資料に就て〉，《理蕃の友》4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年4月），頁10。

59 例如1926-1932年間台北州曾實施兩次短期「蕃語」講習會。理蕃の友發行所：〈蕃語研究熱の勃興と希望〉，《理蕃の友》3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年3月），頁10。

60 台北州理蕃課：〈台北州理蕃課發行之學術講習用蕃語資料に就て〉，頁10。

61 理蕃の友發行所：〈警務局長訓示：昭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於理蕃事務打合會〉，《理蕃の友》114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6月），頁2。

62 當時住在「蕃地」的女性宮川加津江指出，原住民雖然在演習會上使用艱澀堂皇的高級「國語」，平常卻會犯下以「樣」尊稱自己或反之未以之尊稱長輩的基本錯誤。宮川加津江：〈蕃地居住の女性として〉，《理蕃の友》83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8年11月），頁5。

6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高砂族の教育》，頁8、97、100。

64 理蕃の友發行所：〈高砂族の文化〉，《理蕃の友》72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7年12月），頁1。

65 松田京子：〈台湾原住民の法的地位からみた原住民政策の展開——植民地統治初期を中心に——〉，《台湾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3月），頁190。



方針，而此亦與當時樟腦在國際行市的上揚有關。<sup>66</sup>在帝國日本擴大及掠奪的過程中，發現「他者」乃為日本人類學特質之一，因而此時將原住民異化為「頑蠢固執野性如禽獸」、<sup>67</sup>「資性慄悍，屢逞兇爆」、「不知文化為何物」的種族，<sup>68</sup>無疑有助於合理化其對臺灣的殖民地治理及對臺灣山林資源的掠奪。昭和初期，時任總督府囑託的鈴木質在提到原住民族的缺陷時，也使用「粗暴」、「不潔」、「怠惰」、「無智」等字眼。<sup>69</sup>即便到了昭和十年，此一情形也沒有太大的改變。例如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時，日人還將前來觀光的原住民依其近代化程度分組，當中仍可見例如「蒙昧組」、「無能組」等充滿種族歧視字眼的分組名稱。<sup>70</sup>直至中日戰爭之後，戰事日益吃緊，隨著《國家總動員法》與《皇民奉公會》陸續在臺頒布、成立，日人對凝聚人心與人力資源的需求隨之增加，皇民化運動因此加速進行後，相關異化言說才略見收斂。〈山路〉中的同質化敘事，其背景即在於此。

然而，儘管〈山路〉極力呈現日原的同質性，卻也難掩其根深柢固的種族主義。此由文本在勾勒理想的「蕃地」時對於「聖戰」下被犧牲「個我」的「理蕃人」的困境的同情之言說、以及從作者在此同時全然忽略被治理的「蕃人」的災難的書寫策略中，即可輕易窺知。

## 伍、「小我」困境與「聖戰大業」的抵觸

如上，在〈山路〉中，作者既對原住民的皇民化勾勒出理想的藍圖；也對日本人提出聖戰下理想的協同形象，例如對原住民在語言、服飾、信

66 藤井志津枝：《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頁 236。

67 引譯自松田京子：〈台灣原住民の法的地位からみた原住民政策の展開——植民地統治初期を中心に——〉，頁 190。

68 江口良三郎：〈蕃人の接遇と民蕃接触取締方〉，《台灣警察協會雜誌》1 号（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17 年 6 月），頁 23。

69 鈴木質：〈教育所の訓練四〉，《台灣警察時報》6 号（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30 年），頁 23-24。

70 橫尾廣輔：〈博覽会の観光と其の指導教化〉，《理蕃の友》48 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5 年 12 月），頁 2-3。

仰、住宅、飲食文化上的指導，以及通曉「蕃語」及其文化、受徵召上戰場等。另外，小說以小枝子死亡（為「理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火葬（日本化）做為開場，其實也透露出作者對於「蕃界人」的期許。且一開始許多原住民雖反對火葬，認為「難以充份表達心意」，<sup>71</sup>但經日人說明須將遺骨送回日本後，此問題便得到收束。可見異文化衝突固然存在，但絕非為時局與作者所樂見。尤其作者更透過火葬「騷動」即將歸於平靜之際，「蕃地」又被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即通知山田將被徵召的電話吹皺一池春水後的山田的反應描寫，主張聖戰大業當前，小我縮小甚至消失乃屬必然：「這段日子以來山田內心的疲憊在霎那間煙消雲散。」<sup>72</sup>

山田的疲憊固然來自喪妻引發的內面哀傷及喪禮張羅等外在忙碌，也與他身為「理蕃人」的內面葛藤息息相關。事實上，山中警察除了「蕃社」治安、「蕃童」教育外，更「涉及被統治者公私生活全部」。<sup>73</sup>在〈山路〉中，作者則假借原住民頭目之口，表達其對日人在不便的山中工作之同情，並順勢原罪化原住民。在火葬的尾聲，山田看著火焰淚流滿面地向小枝子暗自發誓將好好撫養兒子，以此周全小枝子「以身訓戒」他的「理蕃之途」，並將之視為一生志業。接著在山田前往探視為妻子製作骨灰罈的原住民耆老的途中的內面描述中，作者也略微觸及「蕃地」日警的人生困境：

長長的吊橋在月光的映襯下顯得皎潔如雪。在橋上走著走著，  
山田思考起自己的人生來。然而到頭來除了按照剛才在小枝子的  
亡靈前立下的誓言外，山田實在想不出自己還有別種人生可過。

74

日治時期的「理蕃」為日本治臺的根本問題，<sup>75</sup>「理蕃」成敗又是當時海內外衡量日本皇道政治價值與評判日本是否具備治理異族能力的指標，

71 吉村敏：〈山路〉，頁176。

72 吉村敏：〈山路〉，頁186。

73 土屋一郎：〈理蕃機構の綜合的性格と教育〉，《理蕃の友》105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0年9月），頁3。

74 吉村敏：〈山路〉，頁180。

75 井上英：〈理蕃の友に題す〉，《理蕃の友》創刊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年1月），頁2。

<sup>76</sup>可見當時警察職務之繁重。另外例如營養不良、<sup>77</sup>受腸胃疾病、瘧疾、肺結核等水土不服的「職災」所苦、<sup>78</sup>警界升遷不易、有幼小家眷的日警還有孩子在資源匱乏的山中受教的問題及妻小搬到平地與由此衍生的「遠距家庭生活型態」問題等，<sup>79</sup>這些都種下其苦惱的因子。家眷亦背負不同形式的重擔，而〈山路〉也試圖透過小枝子的死，主張這一點。其實類似小枝子因身「理蕃人」之妻而堪稱亦死於「理蕃」的情節，在歷史上也非虛構。霧社事件中的大坪雅榮、川島多音（川島タネ）、<sup>80</sup>以及死於台中州東勢郡比壽潭事件（1931）的河野伊勢等，<sup>81</sup>其莫非皆因丈夫的職務移居、客死「蕃地」。

即便未死於突發事件，對於隨同丈夫住在山中的妻子而言，其生活也可謂充滿了挑戰。在〈山路〉發表之前，一篇駐在所的日警妻子的雜誌投書提到作者在某個颱風夜飽受驚嚇格外思鄉的心情，以及某夜作者的孩子發高燒，卻因故未就醫，幸虧漢人送來中藥才得以退燒，而此雖令其感念山中存在跨越種族情誼，也令其備感深山生活之艱辛。<sup>82</sup>另外，「灣生」作家中山侑在其收音機劇腳本〈風——某蕃地的駐在所風景〉（〈風——ある蕃地の駐在所風景——〉，1941）當中，也描寫日本巡查妻子的辛苦面相。即某個風雨交加的夜裡夫妻兩宿舍迎來一位自戰場歸來的傷兵訪客，訪客欲尋訪駐守於此的兄長，巡查在透過電話得知其兄獲徵召正準備出發後，遂連忙陪同前往。此時落單的妻子只得仰賴對外聯繫的唯一途徑：警

76 宮尾五郎：〈理蕃事業は皇道日本の誇〉，《理蕃の友》85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9年1月），頁2。

77 翠巒生：〈蕃地勤務者の不平を聴け〉，《台灣警察時報》10号（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30年5月），頁8。

78 篠原哲次郎（編）：〈全島警察官疾病調 邦家の為に健康を保て〉，《台灣警察時報》301号（台北：篠原哲次郎發行，1940年12月），頁117。

79 新竹X生：〈ある巡查の生活記録〉，《台灣警察時報》302号（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41年1月），頁112。

80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上》（台北：時報出版，2009年），頁239-241。

81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上》，頁280-281。

82 行徳子：〈——駐在所風景——或る妻の日記〉，《台灣警察時報》302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内台灣警察協會，1941年1月），頁108-110。

察電話，與鄰近駐在所妻子通訊，以求慰藉。<sup>83</sup>不止如此，事實上日警妻子在山中也要協助耕種，<sup>84</sup>亦被納入「廣義理蕃人」範圍內，被寄予擔任未進入教育所就讀的「蕃童」的教育、<sup>85</sup>協助參與「蕃地」總體教育教化等工作之厚望。

儘管「蕃地」生活艱辛，要脫離似乎也有困難。〈山路〉中的山田除了「理蕃」外別無人生可過，其背景或可回溯到其時許多前往「蕃地」的日人在母國多屬社會底層，而臺灣縱使非長居久安之地，也是一攬千金之地。另外，亦可從刊載於《台灣警察時報》的一篇〈論警察官的轉勤〉（〈警察官の転勤を論ず〉，1931）一文來理解。該文稱都會警察因所處環境日新月異，經常接收新的刺激，有助其適應及業務推動；鄉間警察則因所處環境偏遠，易與時代脫節，且即便職場有流動機制，也並非人人皆可受惠。<sup>86</sup>另外，前述中山侑的收音機劇中也透過巡查夫妻對話，揭露巡查雖嚮往都會生活，但也只能不斷透過山中生活也有優點的自我催眠，以對抗充滿誘惑的都會之面相。<sup>87</sup>可見警察欲離開「蕃地」確有其困難。然而，在〈山路〉的尾聲，當喪禮「騷動」即將平息之際，一通打來通知山田被徵召的電話，卻令他這些日子以來「內心的疲憊在霎那間煙消雲散」，兩日後「急忙踏上山路」、倏地離開「蕃地」。<sup>88</sup>就連山田家的男嬰征男也在作者構築的「理想的蕃界人」射程內。此由小說結尾處山田於下山途中想到征男時的心境描寫中，即可窺知：

〔……〕征男一定會被撫養成為一名男子漢的吧！即使自己在聖戰中成為護國的鬼魂、以及當兵制也在山中頒布時，他們勢

83 中山侑：〈風——ある蕃地の駐在所風景——〉，《台灣警察時報》303 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内台灣警察協會，1941 年 2 月），頁 95-99。

84 松本確：〈蔬菜の害虫駆除剤に就て〉，《理蕃の友》5 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 年 5 月），頁 7。

85 山中樵：〈山の子供達〉，《理蕃の友》3 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 年 3 月），頁 3-4。

86 升井生：〈警察官の転勤を論ず〉，《台灣警察時報》32 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内台灣警察協會，1931 年 5 月），頁 4。

87 中山侑：〈風——ある蕃地の駐在所風景——〉，頁 95。

88 吉村敏：〈山路〉，頁 187。

必也會將征男送上國家大理想建設的舞台的。想到此，山田的心情頓時開朗了起來，他感到此行將是一趟漫長的旅程，於是益發加快步伐，繼續向前趕路。<sup>89</sup>

〈山路〉正是透過此一在「聖戰」符碼面前沒有個我的書寫策略，提出符合時局所需的「理想的理蕃人」形象。至於「蕃人」的困境，並不在這篇小說關心的範圍內，一如由日人移殖到「蕃地」，使「蕃地」既有文化受到壓迫的「火葬」習俗在文本中，竟是做為「蕃人」對日人情意（同情）流露的裝置一般。在中日戰爭爆發的隔月，理蕃當局便一面宣告事變將影響「蕃地」職員的調度，進而影響山地開發與治安維持；一面重申對原住民持續實施日本精神教化與「國語」教育工作的迫切及重要性：

今秋有鑑於肩負本島山地開發與治安維護重任的理蕃人之理蕃使命與時局之重大性，不由益發感到其職責之重大。亦即，高砂族進化現況固然值得注目，然而今日其多數仍缺乏常識，說到底還是缺乏認識時局的理智〔……〕。隨著時局進展及兵役徵召、平地警備支援等相繼展開，蕃地職員也有所異動，是而當務之急便在於將彼等悉數延攬至警察官翼下，使其感受恩德。思及派遣至湖北之野的戰士之勞苦，吾等理蕃相關者當加倍努力，重視彼等精神教化，則即便一朝有事，山地也絕不動搖。亦須指導訓練彼等，以便將來必要時，其能對平地治安的確保有所奉獻。指導訓練之標的乃針對青年，勿忘根本施策在於能培養真正國民情操、信念與資質的國語普及熟練，以及運用國語施予指導與訓練。<sup>90</sup>

由此文可看出，山地開發（目的）及伴隨而來的「理蕃」與教化（手段）之於當時日本治臺的重要性。尤其一九三〇年代以來，除了學校校育外，日本教化更擴及社會教育如部落教化及青年團育成等，而此雖成功導致許多部落的傳統風俗習慣遭到破壞，但反之也存在著堅決抗拒「國語」、

89 吉村敏：〈山路〉，頁187。

90 理蕃の友發行所：〈時局と理蕃人の覚悟〉，《理蕃の友》68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7年8月），頁1。

同化與「志願」的事例。<sup>91</sup>加以中日戰爭以來到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為止，「蕃地駐在所」的職員因戰爭動員調度而明顯減少，<sup>92</sup>而〈山路〉中的山田原本除了「理蕃」以外沒有別種人生可過，但卻因為受到徵召而條地下山，如此的鋪排顯然與時局緊密連動。而作者透過如此的書寫，一方面固然意在明示大時代下小我的「應有」作為；另一方面其實也在為接下來即將「接棒」的原住民（亦適用於隔年實施的「志願兵」制度）立下典範，暗喻這也是原住民即將從「封閉」的「蕃地」走向「開放」的「戰場」的「唯二」人生。然而，小枝子的勞苦與山田的葛藤至少還能被放進「小我」的框架內訴說，原住民的災難卻連隻字都未被提及。換言之，在吉村敏構築的巡查大人「理蕃」烏托邦裡，原住民方無（製造）問題，乃為一大前提（這也才符合「即便一朝有事，山地絕不動搖」的理想境界）。取而代之的，是前述原住民對日本人的理解同情，以及原住民對日本人的「恩惠」歌頌與「報恩」敘事。

## 陸、大東亞戰爭下的「恩惠」歌頌與「報恩」敘事

前已提及，〈山路〉在一開始便著墨小枝子生前對「蕃婦」在日本文化指導上的恩情。另外，小說在開場時，也透過頭目同情日人處境的言說，將「理蕃人」與「蕃人」的關係定調在施恩、犧牲者與背負原罪、受惠者。與此同時展開的，是帝國在臺灣山中的代理人山田甫出生嬰兒的未來該交給誰的命題。在結果揭曉之前，作者並就原住民的適當性如血統、體格、日本化情形等進行正向鋪陳，主張這些都是其成為「被（天皇）揀選的人」的要件。過程中，作者也揭露山田對此「雖不安但別無他途」的心情，<sup>93</sup>並彰顯原住民守護日人的決心。例如巴黨父向山田與石原請求讓其照顧山田的嬰孩，好教他們有機會對「大人」及「國家」報恩、眾人以死明志等，

91 近藤正己：〈異民族に対する軍事動員と皇民化政策——台湾の軍夫を中心にして——〉，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会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東京：綠蔭書房，1988年），頁148、163。

92 辻信治：〈教育先行〉，《理蕃の友》125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2年5月），頁4。

93 吉村敏：〈山路〉，頁183。

<sup>94</sup>以此影射原住民的「志願」姿態。而石原感到「曩昔努力獲得回報」的書寫，則無疑包藏著日人的期待。作者乃如是解釋日原雙方是如何達成責任的託付與承擔的共識。而如此這般的「恩惠」歌頌與「報恩」敘事，則可說與總督府官媒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轍。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擔任蘇聯駐日商務代表處部門主任的布列曼（Y. P. Breaman, Я. П. Бремман）曾以筆名「羅森（A. Rozen, А. Розен）」發表〈血跡斑斑的 40 年（1895-1935 年的臺灣）（Кровавое сорокалетие. [Формоза 1895-1935 гг.]）〉。此文被視為戰前蘇聯「關於臺灣的重要作品」之一，<sup>95</sup>也是戰前「蘇聯持續針對臺灣進行資料蒐集工作」之一環<sup>96</sup>，文章開頭即直指「日本帝國主義正歡慶自己在福爾摩沙稱霸四十年。日本國內及福爾摩沙境內的官媒充斥各種歌頌日本帝國主義『恩惠』的高調言論。〔……〕」<sup>97</sup>羅森所指的歡慶活動即本文前述之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至於官媒中充斥歌頌日本對臺「恩惠」的言說，例如《理蕃之友》的一篇報導便稱一名改姓名的泰雅青年不僅稱讚日治下的臺灣比清朝治下的有更長足之進步，還展現對日本敬神思想的認同與日本在臺近代化治理成果的驚嘆，以及由此衍生的身為原住民的自卑感與對於原住民被納入日人體系下的光榮感與感恩的心。<sup>98</sup>儘管如此，一九三七年新任警務局長的二見直三卻在談及「理蕃」重要性時，仍語帶批判地指出：

〔……〕耗費五千餘名的警察職員與年總額四百萬圓的經費  
於如此稀少的人口，至今不見任何對國家社會有形無形的報恩事

94 吉村敏：〈山路〉，頁 186-187。

95 劉宇衛（Valentin Golovachev）、莫洛賈科夫（Vassily Molodyakov）（著）：陳韻聿（譯），《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文史料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 年），頁 107。

96 劉宇衛（Valentin Golovachev）、莫洛賈科夫（Vassily Molodyakov）（著）：陳韻聿（譯），《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文史料與研究》，頁 111。

97 劉宇衛（Valentin Golovachev）、莫洛賈科夫（Vassily Molodyakov）（著）：陳韻聿（譯），《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文史料與研究》，頁 107-108。

98 中山清：〈青年團幹部懇談会に出席して〉，《理蕃の友》48 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5 年 12 月），頁 8-9。

蹟，此點就我國目前國情而言，不容忽視。<sup>99</sup>

二見上任時，日本閣議已確定朝大陸・南方進出及軍備擴充；臺灣也迎來新任總督小林躋造，確立朝工業化及南進發展。二見所指日本國情應為此。其實在這之前也並非無原住民「赤誠披瀝」的事例，例如戰勝祈願、應召兵送行等。<sup>100</sup>只是當時日本外交經濟均遭逢極大難局，因此上述這些皆遠不及莎韻「死」於為「恩師」送行途中的「報恩」次元。此亦可從莎韻「美談」自一九四一年三月起，便佔據《理蕃之友》紙面長達一年多中，窺得端倪。<sup>101</sup>莎韻死後，日人在其就讀過的利有亨教育所舉辦盛大的青年團葬禮，臺北州知事藤田俱治郎前往其家中及墓前拜訪，臺灣總督長谷川清更贈送「莎韻之鐘」，藉此宣揚「忠孝」與日人的「理蕃」治績。<sup>102</sup>

〈山路〉發表時，莎韻「美談」已傳遍臺灣，<sup>103</sup>日媒亦加以報導。<sup>104</sup>當時臺灣已是「南進基地」，加以在中日戰爭長期化的影響下，警察或縮編或異動的情勢，<sup>105</sup>更令日人寄望原住民能負擔人力資源之一環。這也是何以日人雖對原住民的教化程度及其是否有能力掌握國體意涵高度存疑，<sup>106</sup>卻仍將之納入志願兵制度實施範圍內的緣故。而當時的莎韻「美談」既「堪稱是皇民化運動下的產物」；<sup>107</sup>也可以說是戰爭動員時期下「原住民

99 二見直三：〈非常時と理蕃〉，《理蕃の友》61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7年1月），頁2。

10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高砂族の教育》，頁8。

101 參照《理蕃の友》1941年3-7、9-12月号及1942年1、3、4、6、11月号。

102 理蕃の友發行所：〈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理蕃の友》（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9月），頁8。

103 齋藤生：〈編輯余録〉，《理蕃の友》119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11月），頁10。

104 福岡一市民：〈サヨンの篤行に痛く：感激した福岡市民の手紙〉，《理蕃の友》120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12月），頁7。

105 大石茂雄：〈山地高砂族教育教化に就て〉，《理蕃の友》100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0年4月），頁9。

106 大石茂雄：〈先づ神道を〉，《理蕃の友》117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9月），頁2。

107 下村作次郎：〈日本から逆輸入された『サヨンの鐘』の物語——中央舞台の台湾上演と吳漫沙の『サヨンの鐘』〉，收入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台湾の「大東亞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185。



的情感象徵」。<sup>108</sup>據此，〈山路〉中肩負重任的「蕃婦」人設之與沙韻「美談」及時局的高度連動，不言自明。而這一點從畫家鹽月桃甫在為《皇國之道》第一號（《皇国の道》第一号，1942）的封面所繪製的象徵莎韻意象的表紙繪的解說中的「高砂族少女全是莎韻少女」一語中，<sup>109</sup>亦可管窺一斑。

〈山路〉不只主張日人施恩與原住民報恩，亦主張日人應將原住民的報恩再「回向」給對方，以促進雙方恩情授受之循環。即，在山田前往拜訪耆老的場景中，作者透過推崇原住民雕刻傳承及山田端詳老人認真工作模樣時「從他那佈滿皺紋的臉龐感受到一種誠然尊貴的純粹」之書寫，<sup>110</sup>尊貴化原住民。並藉由老人不輕易幫人製作工藝品，卻接受山田請託連夜趕製，而此令山田感到是夫妻兩人從「蕃社」奉獻中獲得的回報，故「餘生也要為其奉獻，視之最大使命」此一書寫，<sup>111</sup>期許日人在收獲原住民的「報恩」後，再將之反饋到「理蕃」大業上。作者正是藉由「施恩」與「報恩」終須為「蕃界人」所共有的此種將前者做為控制後者「實踐臣道」的緊箍咒之書寫，形塑「理蕃」烏托邦的另一向度。

「報恩」思想體系在中國隋唐時期完成，其中包含儒家倫理的核心價值「孝」，即「父母之恩」。而包括「孝」在內的「報恩」思想也被視為日本「報恩」思想的出發點，<sup>112</sup>其做為一種觀念意識，不僅流入鎌倉乃至整個中世時期的尤其是中下層庶民及農民等被支配階級，<sup>113</sup>也在真宗教團化的組織過程運動中，逐漸於封建社會體制包括武士的主從關係、武士與農民的階級關係中，受到制度與規範化。<sup>114</sup>江戶幕府時期，初代將軍德川家康更以「義理」做為制定社會秩序，尤其是武士階級內部秩序的道德意

108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219。

109 鹽月桃甫：〈表紙繪解說〉，《皇国の道》1号（台北：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1942年6月），頁71。

110 吉村敏：〈山路〉，頁181。

111 吉村敏：〈山路〉，頁181。

112 鈴木宗憲：《日本の近代化と「恩」の思想》（京都：法律文化社，1964年），頁32-33。

113 鈴木宗憲：《日本の近代化と「恩」の思想》，頁42-43。

114 鈴木宗憲：《日本の近代化と「恩」の思想》，頁45-46。

識。<sup>115</sup>而後，國體意識覺醒，此後雖幾經漲落，每逢攸關日本國家前途存亡之際如日清及日俄戰爭、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等爆發時，則再度高揚。

116

國體主張帝國奉萬世一系的天皇皇祖神勅，萬古不易，並基於此大義，「以一大家族國家奉體億兆一心聖旨，克盡忠孝之美德」。<sup>117</sup>而基於「日本精神已臻須自狹隘見解中脫皮擴大為世界性規模的時機」<sup>118</sup>此一與日本帝國領土擴張野心勾結的思維，國體精神持有者的人種射程也被對外加以擴大。<sup>119</sup>在臺灣的演繹，根據《皇民讀本》，則全島民皆被包攝在浩蕩皇恩披澤的範圍之內，並被寄予成為「忠良臣民」及「赤子」，「在皇恩浴下扶翼皇運」，對皇恩「感謝」、「感激」之厚望。<sup>120</sup>而事實上，中日戰爭以後，包括教化、經濟政策協力（愛用國貨及樽節等）、保安（包括流言蜚語）、衛生等等，幾乎所有事項都被列入「國家報恩」的範圍內。<sup>121</sup>而此種被視為具有「非本意性」的日本的「義理」、「報恩」意識，<sup>122</sup>也被日人拿來套用在「蕃地」，成為「蕃地」難以掙脫的「重中之重」。

## 柒、巡查大人的「理蕃」烏托邦： 親密關係與內臺融合的破綻、「恩惠」歌頌與「志願」 敘事的暴力

### 一、親密關係與內臺融合的破綻

〈山路〉中提到的日人與臺灣住民之間的互動密切，在戰前臺灣文獻

115 鈴木重雄：《日本精神史要論》（東京：理想社，1942年），頁323-324。

116 鈴木重雄：《日本精神史要論》，頁353-359。

117 上田光輝：《皇民讀本》（基隆：淨土宗青年聯盟，1939年），頁6。

118 鈴木重雄：《日本精神史要論》，頁360。

119 鈴木重雄：《日本精神史要論》，頁359-363。

120 上田光輝：《皇民讀本》，頁1-2。

121 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事項〉，《新竹州時報》（新竹：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1937年12月），頁39-41。

122 長野晃子：〈義理は日本文化に固有のものか〉，《東洋大学社会学部紀要》38卷1號（東京：東洋大学社会学部，2000年12月），頁55-74。

中並不難找到相關記載，前述巡查妻子在日記中提到的日臺人跨越族群藩籬人道互助的經歷即為一例。<sup>123</sup>該作者並描述其為臺灣小孩剃頭，而臺灣母親回贈以蕃薯的雙方友好互動風景。然而，作者也為其對臺人的「敦親睦鄰」之舉下了極具殖民政治意涵之註腳：「皇民化就從剃頭起」。其並於回應總督府政策提到某次前往漢人聚落遊憩時因無法與在地良好溝通而體認到「國語普及」（而非漢人語言理解）的重要之經驗。<sup>124</sup>可見所謂「內臺融合」乃以壓迫臺灣文化為前提，堪稱是日方的一廂情願。另外自一九四〇年起，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臺灣社會出現對日本戰敗之臆測。影響所及，「民心思變，『回歸祖國』、『爭取獨立』情緒瀰漫」。當時警察尤其關注此時局下的民情調查。臺灣特高警察也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隔年四月間大規模檢舉「叛亂份子」。事件震驚全台，遭起訴者眾並涵蓋社會各階層。<sup>125</sup>儘管事件後來因日本投降、涉案者皆獲釋而落幕，<sup>126</sup>事件本身即足以戳破「內臺融合」的幻想。

再者，即便霧社事件已過了兩年多，依然可見各「蕃地」警員及家屬等將孩子交給「蕃童」照顧卻不給薪水、日人向「蕃婦」買霸王菜或日人毆打「蕃人」等景象。對原住民而言，「沒有比這更大的恥辱。」<sup>127</sup>故稱雙方之間毫無芥蒂，實屬荒謬。即使在中日戰爭的內涵已轉為新東亞建設之際，日人也坦承，「高砂族皇民化的政績屬表面的成果較多」。<sup>128</sup>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夜，臺東廳關山郡北絲闔溪沿岸的「蕃地」還發生一宗以抗爭（遷村）為本質的「蕃人行兇案件」。<sup>129</sup>可見「蕃界人」的關係絕非如〈山路〉中描繪的那般毫無齟齬；「蕃界」更確實存在著抵抗日本

123 行德子：〈—駐在所風景—或る妻の日記〉，頁 109-110。

124 行德子：〈—駐在所風景—或る妻の日記〉，頁 109。

125 寺奧德三郎（著）：（財）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日本殖民統治下之「高雄叛亂事件」／代譯序〉，《臺灣特高警察物語》（臺北：文英堂出版社，2000 年），頁 3。

126 寺奧德三郎（著）：（財）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日本殖民統治下之「高雄叛亂事件」／代譯序〉，頁 4。

127 理蕃の友發行所：〈新來理蕃人の悩〉，《理蕃の友》12 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 年 12 月），頁 5。

128 高橋生：〈油断大敵〉，《理蕃の友》85 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9 年 1 月），頁 2。

129 台湾總督府警務局：〈内本鹿ブヌン族の兇行〉，《理蕃の友》112 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 年 4 月），頁 3。

帝國主義之動向。關於這一點，春山明哲在從昭和歷史的角度探討霧社事件時也提到，被統治者方的動向乃包括了「抵抗、武裝蜂起、協力、反撥、挫折及受忍、等等。」<sup>130</sup>

## 二、「恩惠」歌頌與「志願」敘事的暴力

〈山路〉中的「恩惠」歌頌之暴力不外在於前述作者將日原關係定調在施恩及犧牲者、背負原罪與受惠者的書寫策略，以及對日人「施恩」真相與原住民「報恩」背景的隱蔽，彷彿日原恩情的授受本身即為一不證自明之理。另外，儘管〈山路〉對於小枝子、以及在期許山田留在恩情授受的循環模式內之餘也流露對其的同情，但原住民卻全然被排除在此思維的範圍之外。就此意義而言，〈山路〉不僅帶有將日本國體思想硬套在原住民社會，以期日後可撇清責任歸屬的暴力性，<sup>131</sup>儘管小說竭力拉近日原距離、鋪陳日原的同質性，其根深柢固的種族主義乃成為小說的底流，與前述文本的「建前」（Tatemaе）敘事互為表裡。

再者，即使將原住民對日人充滿感恩的現象歸諸教化的奏效，在此仍需留意，教化固然具關鍵作用，但若非「蕃地」既有的封閉性與集團性、「理蕃」機構在「蕃地」的高密度設置及此特性導致的「理蕃」力更易滲透、「理蕃」機構具有的綜合性（「蕃地」被賦予政教合一願景、「蕃地」警察身兼多重角色）、接觸性（日原形同共同生活，整個「蕃地」等同學校）與一元性（「理蕃」職員掌理所有政事務，大權在握）等，<sup>132</sup>僅靠教化恐不足以致之。換言之，正是這種有如全景敞式監獄（Panopticon）般的密閉空間與身體規訓及日人企圖大規模將日本文化強力滲透到部落並壓迫部落既有文化，以致部落既有文化遭到物化（cultural reification）的暴力性，

130 春山明哲：〈昭和歷史における霧社事件——殖民地統治の政治過程分析——〉，《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号（東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会，1978年4月），頁121。

131 傅琪貽（藤井志津枝）：〈臺灣高砂義勇隊是「志願」還是「強擄」？〉。初出2007年5月6日強擄人夫和戰時暴力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強擄人夫問題發表。此處參照 <https://groups.google.com/g/yotu/c/t8oRGQyQI7c?pli=1>

132 土屋一郎：〈理蕃機構の綜合的性格と教育〉，頁3-4。

<sup>133</sup>才是為當時希冀成為或努力成為日本人，進而「志願奉公」的原住民提供使其到達如此決意的最重要背景之一。

在「志願兵」制度實施的消息公布後，確實有原住民基於愛「國」心「志願」報名參加。例如改姓名的武山勝雄（劉德祿）表示，當派出所警察前來徵召時，他「希望為國家貢獻，犧牲自己來做事」，便前往報名。<sup>134</sup>且當時包括「蕃地」在內，臺灣各地確實也出現許多感激與慶祝志願兵實施的活動，其中還包括「血書志願」的風潮。對於此種現象，周婉窈認為「不是很容易了解，如果說臺灣青年全是被迫的，不能不說是相當粗糙的說法。」<sup>135</sup>就前述武山勝雄的例子而言確實如此。但也有原住民是在被日方灌輸錯誤認知的情況下被送上戰場的，例如第三回「高砂義勇隊」員生還者新竹泰雅族 Payan Tenu（雲有輝）便證言，日人的說法讓他以為「戰爭等於打獵」；另外，亦有人是基於家庭經濟考量。<sup>136</sup>而日方鼓吹「當兵真好」也產生某程度的影響。<sup>137</sup>

另外根據近藤正己針對當時「志願兵」制度在臺施行發表後三個月內各地「志願」狀況調查顯示，以族群別而言，「高砂族」與客家族群就人口比例而言偏高。即，「愈是少數族群，志願率愈高」，而且「族群愈是弱勢，愈是受到強迫的狀況也很清楚」。<sup>138</sup>其中透過學校、警察、保甲等組織動員，導致「集團志願」的情況亦所在多有。<sup>139</sup>「蕃地」的集團志

---

133 保羅·D·巴克萊 (Paul D. Barclay) 認為，「當代世界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由遷占者國家和其大多數人口所主宰。因此，不論基於商業或政治的理由，原住民常覺得其身分不論在法庭或市場，都被迫符合外來者的期望。文化物化 (cultural reification) 是日本在臺殖民統治所留下的一項重要遺產。」保羅·D·巴克萊 (Paul D. Barclay) (著)：堯嘉寧 (譯)，《帝國棄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頁 366。

134 周婉窈主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 14。

135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臺北：聯經出版，1999年)，頁 169。

136 傅琪貽 (藤井志津枝)：〈臺灣高砂義勇隊是「志願」還是「強擄」？〉。

137 傅琪貽 (藤井志津枝)：〈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出發前夕的臺灣——1940年日軍南進的系譜〉，收入《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頁 260。

138 近藤正己：〈異民族に対する軍事動員と皇民化政策——台湾の軍夫を中心にして——〉，頁 148-150。

139 近藤正己：〈異民族に対する軍事動員と皇民化政策——台湾の軍夫を中心にして——〉，頁 150-152。

願也是以部落等為單位的競賽活動。可見原住民的「志願」背後有諸多複雜的因素，其中亦不能排除「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效應導致者，<sup>140</sup>而絕非〈山路〉中所呈現的只因日本教化的成功，便足以令原住民因此感恩，進而到達「全體志願」奉獻赤誠之境的那種線性構圖與統一調性。

## 捌、結論

目前有關吉村敏作家作品研究尚屬稀少。少數論及吉村敏的臺灣文學作品者，均留意到其中的軍國主義色彩、國策協力面向（山中、星名、林）與不接地氣（中島），唯由於缺乏對作品的深入討論與對作家及其文學歷程的考察，以致立論基礎顯得片面而薄弱。本文首先透過吉村敏在臺活動及其文學歷程的初探，填補了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作家作品研究的一頁空白。結果顯示，無論是臺南州小・公學校時期或臺北放送局文藝部時期，吉村敏的任職機構均隸屬官方，其職務亦皆與官方思想、政令宣揚密切相關；其創作內容亦多與時局即大東亞共榮圈願景下的「南進」政策與「志願兵」等議題緊密連動，具有強烈的國策協力色彩。而這應也是莊永清所指吉村敏等日人作家在臺灣文學史上扮演的角色具「全島性乃至世界性（東亞性）的文學意義」的由緒之一。

另一方面，目前有關〈山路〉的討論（星名、林）雖留意到小說具有的殖民政治性，但由於皆非專論而僅概述性觸及，是而未能深入探討其與大時代的具體連動情形，也因此未能深刻彰顯文本的暴力性。透過本文對〈山路〉的深入考察結果顯示，〈山路〉以「（廣義）理蕃人之死」做為開端（恩情），接著書寫「蕃界」種族親密關係、「理蕃」政策成功、「聖戰」當前的個我收斂、「恩惠」歌頌與「報恩」、影射原住民的「志

---

140 德國民意學者伊莉莎白諾爾-紐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於1973年形塑的概念，用以描述「對周遭情形的觀察，會再影響別人是採取大聲表明立場，或是保持沉默，不敢表達自己的看法，直到形成一種螺旋的過程，公開表明的意見完全取得優勢地位，而其他的意見則從公開表達的場域消失，而至全然沉默不語」的民意形成過程。參照 Elisabeth Noelle-Neumann（著）：翁秀琪等（譯），《民意——沉默螺旋的發現之旅》（臺北：遠流出版，1994年），頁15-24。

願」等，皆與日本「南進」政策及「志願兵」即將在臺實施、日本在臺加速皇民化運動與同質化言說、宣揚國體意識及莎韻「美談」（死於「報恩」）等時局、國策緊密連動，可回收到前述吉村敏的臺灣文學系譜裡。尤其〈山路〉中雖流露些許人本關懷，但對象僅限「理蕃人」，作者並對其加以美化；在此同時，作者也全然犧牲、隱蔽「蕃地」真正的底層即原住民的葛藤與困境及文化浩劫等災難。就此意義而言，不僅其人本關懷有源自種族主義的侷限；其殖民主義的橫暴也更形強化。若再思考文本極力鋪陳日原親密關係與同質性敘事，則此一書寫策略無疑更加暴露皇民化的侷限與暴力，原住民終究無法被真正視同日本人看待。

未來關於吉村敏的研究仍極待充實。尤其，吉村敏之所以獲選為派遣作家，除了因其滿足當局所規定的「居住臺北附近者」之基本條件（當時只動員臺北附近在住者）、<sup>141</sup>應獲派遣的作家如與吉村同屬臺北放送局的中山侑當時已被徵調前往戰線有關外，<sup>142</sup>其曾隨臺北放送局以報導班員身份渡菲、更重要的，其曾採訪並撰寫過送子出征的「高砂義勇隊」員的母親與日本南北朝武將楠正行的母親等帝國日本之母的時局精神的報導與隨筆、曾投入包括〈山路〉在內等諸多反映時局與唱和國策的作品書寫經驗等等，這些應該都是當局考量之因素。未來持續透過對於吉村敏的臺灣書寫，包括「志願」、「護鄉」、「產業戰士」等系列議題在內的作品群的考察，將有助於深化對於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作家的原住民表象及臺灣表象之理解。

另外，吉村敏於一九四四年六月獲總督府情報課選為派遣作家，前往臺灣島內公用地描繪「要塞臺灣的戰鬥姿態」。<sup>143</sup>在此行感想文〈從築城現場歸來〉中，吉村敏提到其曾在菲與同樣以報導班員身份前往彼地的日本戰地作家尾崎士郎、火野葦平的相遇經驗，並提到在兩人捨命奉公身影

141 初出《臺灣文藝》1卷2号〈編輯後記〉。此處參照中島利郎：〈『決戰台湾小説集』の刊行と西川滿〉，收入藤井省三等（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85。

142 中島利郎：〈『決戰台湾小説集』の刊行と西川滿〉，頁87。

143 矢野峰人：〈序〉，收入台湾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湾小説集》（乾の巻）（台北：台湾出版文化株式会社，1944年12月），頁3。

的影響下，令其使命感倍增。<sup>144</sup>垂水千惠指出，臺灣的作家派遣，明顯是取法自日本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派遣從軍文藝家即「筆部隊」至中國、以及在「國民徵用令」也適用於文學者後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起徵用並派遣作家至南方的例子。<sup>145</sup>而在吉村敏訪菲期間與回臺後發表的作品中，不僅可見許多以菲見聞為素材的創作，亦可見對臺灣的著墨。未來透過吉村敏的臺灣書寫與「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南洋」書寫以及日本南方徵用文學的交互參照與比較考察，亦將有助於進一步探究日治末期臺灣做為帝國日本南進基地／鎖鑰／要塞的時代性意涵。最後，如前所述，吉村敏不僅與《決戰臺灣小說集》的臺籍作者群之一的楊雲萍有公私上的往來，與其它臺人例如改姓名的千田千馬（詹天馬）亦有交誼。<sup>146</sup>未來透過相關考察，亦當有助於深化對於日治末期日臺人文學奉公與交流情形之理解。

### 附件：吉村敏作品年表

序號	作品名稱	出處	出版地	出版單位	出版年月	頁數	文類	主題／要旨	作者（所屬、身份或介紹）
1	〈五十音〉（〈アイウエオ〉）	《台灣教育》375号	台北	社團法人台灣教育會（以下簡稱「台灣教育會」）	1933・10	115	歌詞	「國語」普及歌。強調不會國語生活不便。臺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懸賞募集佳作。	吉村敏
2	〈臺灣農村公學校兒童的生活〉（〈台灣農村公學校兒童の生活に〉）	《台灣教育》389号	台北	台灣教育會	1934・12	53-64	隨筆	有感於公學校童「國語」能力差、未就學童僅會臺灣傳統歌，吉村以貼近臺童生活元素創作「國語」歌以期提升其「國語」力。	吉村敏（台南州東石郡蒜頭公學校）
3	〈與小學生〉	《台灣教育》397号	台北	台灣教育會	1935・12	97-	隨筆	透過師生野外體	吉村敏

144 吉村敏：〈築城現地より帰って〉，收入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文芸評論集 第五卷》（東京：綠蔭書房，2001年），頁283-284。

145 垂水千惠：〈一九四〇年代の台灣文學——雜誌『文芸台灣』と『台灣文學』〉，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灣文學》（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年），頁128-129。

146 中研院臺史所藏：〈吉村敏所寄信函〉，1944年6月24日《楊雲萍文書》。



	共赴夏之約) (〈夏を小学生と行く〉)	《教育》399号	北	育会	10	102	筆	驗對話宣揚農育，暢談正統「國語」觀及導入楠正成等忠臣典範。	(朴小)
4	〈粉筆盒〉 (〈チョーク箱〉)	《台湾教育》402号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36・1	135-139	隨筆	批判公學校臺籍女教員無教育熱忱而僅將粉筆盒視為婚前的鍍金道具。	吉村敏
5	〈某一天〉 (〈思ひ出すこと〉)	《黎明》46号	台北	台湾教育会社会教育部	1936・3	9-10	詩	透過火車上「國語」夜學生與陌生阿姨的對話，勾勒欣喜被稱讚懂「國語」的臺人形象。	吉村守 (台南朴子小学校)
6	〈夏・泳〉 (〈夏水於与支〉)	《台湾教育》409号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36・8	81-85	隨筆	爬梳游泳在日起源及傳播，主張其與日本今日地位相關。並指其它運動短期內有好表現乃因重視日式傳統與實用性。	吉村敏 (朴小)
7	〈牛〉 (原文同)	《台湾教育》415号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37・2	71-76	小說	成績家境成對比的兩同學在放學路上局勢反轉：弱者霸凌強者。但當弱者因牧牛意外死後，恐懼則已化為追憶。	吉村敏 (朴小)
8	〈千人針〉 (原文同)	《新竹州時報》時局特輯第六輯	新竹州	新竹州時報発行委員会	1938・2	11	歌謠	時局青年歌謠。描寫戰時下後方對戰士的支援。	吉村敏
9	〈久坊〉 (原文同)	《台湾教育》430號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38・5	65-67	隨筆	透過校園霸凌事件強調正義並曉諭孩童日本將扮演以正義領導世界要角之理。	吉村敏
10	〈鳳凰花〉 (〈鳳凰木の花〉)	《台湾教育》432号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38・7	76-79	隨筆	透過師生讚嘆校內鳳凰花的對話嵌入戰時下日本精神不應一味模仿西方之理。	吉村敏
11	〈兄弟鬩牆〉 (〈兄弟喧嘩〉)	《台湾教育》441號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39・4	78-80	隨筆	暢談父母經，觀察手足吵架有助感情培養。	吉村敏
12	〈隨想兒童街〉 (原文同)	《兒童街》創刊号	台北	台北兒童芸術協会	1939・7	9	隨筆	憶兒時放學後到建築空地以樹枝築起兒童街，某	吉村敏

								日卻發現其遭破壞的遺憾記憶，以此欣慰祝賀《兒童街》的創刊。	
13	〈黃色大理石〉（〈黄色な大理石〉）	《ねむの木》	台北	ねむの木社	1939・12	4	詩	兄出征前留下的大理花，成為告慰戰死兄的另類勳章；弟則始終未從兄處得到兄力剋「支那」的坦克伴手禮。	吉村敏
14	〈童性本善〉（〈子供は総て〉）	《台湾教育》457号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40・8	78-81	隨筆	失去愛兒使作者對學生多了柔軟與同理心，感悟童性本善。作者也透過喚起全班的同理心，為其教員生涯劃下美好句點。	吉村敏
15	〈都是好孩子〉（〈みんなよい子〉）	《手輕に出来る青少年劇脚本集》第一輯	台北	台湾總督府情報部編	1941・4	189-206	戲劇	放學後的小公學校學生以談論日人同學暑假將赴「內地」靖國神社祭拜其戰死將校父親一事為開端各抒己志，並透過臺籍同學宣讀其父遺書，主張時局下的日本乃是為東亞和平而戰。	吉村敏 兒童劇 演劇腳 本
		收入河原功編，《台湾戲曲・脚本集二》	東京	綠蔭書房	2003・2	267-284			
16	〈傻父母〉（〈親馬鹿〉）	《台湾教育》468号	台北	台湾教育会	1941・7	74-75	隨筆	以自身經驗抒發他人善待己孩時，父母欣慰歡喜的傻父母現象。談論父母經。	吉村敏
17	〈悲運的鄭氏〉（〈悲運の鄭氏〉）	《台湾地方行政》7卷7號	台北	台湾地方自治協會	1941・7	92-102	小說	描述鄭氏三代興衰史，透過陳永華失勢與明鄭沒落，暗喻忠臣／忠誠的重要；並透過舖陳鄭成功自述具日本血與日為義理之國、鄭目標實放眼於南方等，主張日本治臺與南進政策一脈相承的正	吉村敏 （「久住台南，以鄭成功的研究知名，最近轉入JFAK文藝部」）
		收入中島利郎編，《台湾通俗文学集二》	東京	綠蔭書房	2002・11	309-319			

								當性。	
18	〈潮音〉 (原文同)	《台湾 通信協 會雜 誌》	台 北	台湾通 信協會	1941・ 8	116- 119	小 說	有理想的教師因 不迎合上司而轉 校，並在受到海 洋洗禮與教育理 念實踐後獲得重 生。	吉村敏 (台北 放送局 編成掛 員)
19	〈關於臺灣 的志願兵 制〉(〈台 灣の志願 兵制につ いて〉)	《科学 の台 灣》9 卷4号	台 北	台湾博 物館協 會	1941・ 10	14- 18	隨 筆	為將實施的「志 願兵」制度追本 溯源，指其有史 可考，且最早乃 以「高砂族」為 主體。	吉村 守、堀 川安市
20	〈山路〉	(一) 《台湾 警察時 報》312 号	台 北	台湾警 察協會	1941・ 11	51- 57	小 說	透過日警妻子的 葬禮書寫描述日 原親密關係。並 透過原民積極 「志願」爭取失 去妻子且受徵召 的日警所留嬰兒 的撫養任務之書 寫，影射原住民 亦適用之的徵兵 制度實施在即的 原住民的「志 願」立場。	吉村敏
		(二) 《台湾 警察時 報》313 号	台 北	台湾警 察協會	1941・ 12	68- 75			
		收入星 宏 修・中 島利 郎編 《台湾 純文 集二》	東 京	綠蔭書 房	2002・ 11	175- 187			
21	〈麵包與孩 童〉(〈パン と子 供〉)	《台湾 教育》 474號	台 北	台湾教 育會	1942・ 1	66- 68	隨 筆	透過買麵包事件 批判大人傷害童 心，並主張重視 國家棟樑才符合 大東亞建設精 神。	吉村敏
22	〈南海秘談 昆島物語〉 (〈南海秘 話 コン島 物語〉)	《台湾 地方行 政》8 卷1号	台 北	台湾地 方自治 協會	1942・ 1	124- 138	小 說	描寫日軍登陸昆 島的艱辛與暹羅 國王的協助與恩 情、日本對法領 印度支那的仇 恨。其中日泰親 密關係的書寫具 神話性格。	吉村敏 (台北 放送局 員)
		收入中 島利 郎編 ，《台湾 通俗文 集二》	東 京	綠蔭書 房	2002・ 11	321- 335			
23	〈小春日 和〉(原文 同)	《台湾 警察時 報》314 号	台 北	台湾警 察協會	1942・ 1	108- 115	小 說	透過巡查調查自 臺南家中北上無 心課業的少年的 離家動機為購買	吉村敏

		收入星宏修・中島利郎編，《台湾純文学集二》	東京	綠蔭書房	2002・11	189-196		製作滑翔翼高級材料之由緒，主張尊重孩童興趣的重要，並回應航空思想普及之時局。	
24	〈光榮歸來〉（〈光榮に帰る〉）	《演劇脚本集》	台北	台湾子供世界社	1942・6	67-84	戲劇	皇民鍊成劇。透過臺籍中流農家一家的互動，歌頌志願兵制度。	吉村敏
		收入河原功編，《台湾戲曲・脚本集三》	東京	綠蔭書房	2003・2	81-98			
25	〈紅豆和煎餅〉（〈モンゴとアパー〉）	《台湾文学》2卷4号	台北	啓文社	1942・10	138-141	隨筆	藉由美國治下的日本「南進先覺者」昔日被菲以「紅豆」「煎餅」蔑稱的歷史，讚嘆今日大東亞戰爭下日軍皇威之顯赫。	吉村敏
26	〈追憶馬尼拉〉（〈マニラに憶ふ〉）	《台湾公論》7卷11号	台北	台湾公論社	1942・11	64-68	隨筆	記錄皇軍入菲時與攻陷巴丹後，市民對其態度由不安轉為信賴與歡迎的過程。並歌頌大東亞思想，期許菲具備大東亞民族之自覺。	吉村敏
27	〈（創作）軍事書簡〉（〈（創作）軍事郵便〉）	《台湾公論》7卷11号	台北	台湾公論社	1942・11	91-96	書信	透過後方妻子與前線丈夫的書信往返抒發鄉愁、歌誦鄰組互助愛、形塑堅毅妻子形象，並安撫戰死者遺族以戰死者眾，宜克制傷悲。最後呼籲後方做好最壞打算，以讓前線戰士無憂應戰。	吉村敏
		收入星宏修・中島利郎編，《台湾純文学集二》	東京	綠蔭書房	2002・11	243-248			
28	〈菲律賓人之我見〉（〈見た比律賓人〉）	《台湾警察時報》324号	台北	台湾警察協會	1942・11	38-45	隨筆	報導日軍進城後美軍的失勢及日軍的受歡迎；指菲人底流為東洋人，文化中有近	吉村敏（台北放送局文芸部員）

								似日本處，願其盡早具備大東亞民族意識。	
29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1)〉 (〈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図(1)〉)	《民俗台灣》2卷11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2・11	30	隨筆	介紹菲最原始的打擊樂器Kalutang。	吉村敏
30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2)〉 (〈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図(2)〉)	《民俗台灣》2卷12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2・12	47	隨筆	菲古樂器Kulintang介紹。	吉村敏
31	〈山中母親訪記：拜訪高砂義勇隊之母〉 (〈山の母を訪ふ記：高砂義勇隊の母を訪ねて〉)	《台灣公論》7卷12号	台北	台灣公論社	1942・12	52-57	隨筆	透過拜訪戰歸的高砂義勇隊員母親時與母、妻的對話，鼓吹原民義無反顧報效「山中之父」日警的恩情與皇恩之必然。	吉村敏
32	〈比島遊記茉莉花〉 (〈比島遊記サンパギータ〉)	《台灣地方行政》1943年1月号	台北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1943・1	112-115	隨筆	從觀察菲人摯愛茉莉花及臺灣也有此花為發端，主張菲看似受美影響，實則流著東洋人的血，故應為大東亞建設獻力。	吉村敏 (台北放送局員)
33	〈建設之譜〉(〈建設の譜〉)	《台灣公論》1943年1月号	台北	台灣公論社	1943・1	186-204	小說	報導菲的日語學習熟，並透過日人主角與美國治下渡菲的日本「南進」先驅移民與菲女性的混血女兒的對話，抨擊英美，頌揚大東亞共榮圈思想。	吉村敏
34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3)〉 (〈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図(3)〉)	《民俗台灣》3卷1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1	29	隨筆	菲竹製樂器Bunkaka / Bilbil介紹。	吉村敏
35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4)〉 (〈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図(4)〉)	《民俗台灣》3卷2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2	24	隨筆	介紹菲鼓樂器Tugo。	吉村敏 (台北放送局)

	イリッピン古樂器圖(4))								文芸部員)
36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5)〉(〈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圖(5)〉)	《民俗台灣》3卷3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3	27	隨筆	介紹菲特殊的古老鼓樂器 Ludag, Neguet, 並指南呂宋某地的太鼓之菲語乃源自西語。	吉村敏
37	〈敵愾心〉(原文同)	《台灣文學》3卷2号	台北	台灣文學社	1943・4	91-100	隨筆	透過介紹日本南方外地美國人收容所, 說明日本對美國的敵愾心之形成由緒, 並以日人遭美監禁時飽受欺凌為由, 主張珍珠港事件宛若日軍對外地受監禁日人的神救援, 藉此推崇皇軍。	吉村敏
		收入星宏修・中島利郎編, 《台灣純文學集二》	東京	綠蔭書房	2002・11	387-396			
38	〈馬尼拉見聞記(其二)音樂〉(〈めいにら見聞記(その二)音樂のこと〉)	《台灣公論》昭和18年4月号	台北	台灣公論社	1943・4	82-85	隨筆	吉村以報導班員身份渡菲, 記錄菲樂樣貌, 指其缺乏東洋香氣; 並爬梳西班牙治下的菲樂變遷, 指美樂雖滲入, 卻未若西樂影響深, 也未誕生新型態音樂。	吉村敏
39	〈馬尼拉見聞記(其三)洗濯論〉(〈めいにら見聞記(その三)せんとく論〉)	《台灣公論》昭和18年5月号	台北	台灣公論社	1943・5	106-107	隨筆	從日與菲的衣物洗濯法不同中, 體悟到二者民族性的不同。而作者予以菲文化高度認同, 認為其亦有值得評價之處。	吉村敏
40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6)〉(〈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圖(6)〉)	《民俗台灣》3卷5號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5	47	隨筆	介紹菲樂器 Kulintang。	吉村敏
41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7)〉(〈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圖〉)	《民俗台灣》3卷6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6	24	隨筆	介紹菲樂器木琴 Gabbang。	吉村敏

	(7) ) )									
42	〈敗鏡尼〉	《台湾地方行政》9卷6号	台北	台湾地方自治協會	1943・6	33-36	隨筆	歌頌送子出征的楠正行的母親敗鏡尼的故事，以此頌揚大東亞建設戰下日本母親送子征戰的精神。	吉村敏	
43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8)〉 (〈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圖誌(8)〉)	《民俗台湾》3卷7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7	17	隨筆	介紹以口、舌、手彈奏之菲樂器Subing。	吉村敏	
44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9)〉 (〈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圖誌(9)〉)	《民俗台湾》3卷8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8	37	隨筆	介紹菲三種笛樂器(其中之一令作者聯想起日本雅樂)。	吉村敏	
45	〈菲律賓古樂器圖誌(10)〉 (〈フィリッピン古樂器圖誌(10)〉)	《民俗台湾》3卷9号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9	48	隨筆	菲樂器五種以上的笛子種類介紹。	吉村敏	
46	《護鄉兵》(原文同)	單行本	台北	盛興書店出版部	1943・11	1-162	戲劇	強調「護鄉兵」為「志願兵」前身，並描述日治初期卑南族與日軍的關係，其中除了書寫頭目女兒與部落英雄的戀情外；也稱頌協助日軍武統臺灣的原民士兵及皇軍的驍勇。	吉村敏	
		收入中島利郎編，《台湾戲曲・脚本集四》	東京	綠蔭書房	2003・2	5-168				
47	〈床母〉(二幕) (原文同)	《台湾文学》4卷1号	台北	台湾文学社	1943・12	34-47	戲劇	透過臺籍乳母阿琴與「內地」人一家的互動，書寫臺日親密關係：知(乳)子莫若(床/乳)母)。並歌頌貫徹內地式育兒法的臺人與送子出征的日本母親。	吉村敏	
		收入中島利郎編《台湾戲曲・脚本集五》	東京	綠蔭書房	2003・2	443-456				
48	〈金山拾遺〉(〈かな山拾ひが〉)	《いしずゑ》創刊号	台北	台湾鐵道協會	1944・2・18	28-29	隨筆	報導金瓜石礦業「產業戰士」職域奉公的身影。	吉村敏 (台北放送)	

	き))								局)
49	〈街頭小説 毛髮再生〉 （〈辻小説 傷の毛〉）	《いし ずゑ》2 月号	台北	台湾鉄 道協会	1944・ 2・19	26	小説	昔日曾遭日人斥 喝怠工、頭部挨 拳的臺人礦工， 在該日人戰死後 重返石炭礦坑現 場。此時其頭傷 既癒、髮毛亦 生，搖身蛻變為 石炭增產國策的 協力先鋒。	吉村敏
		收入中 島利郎 編 《「台 湾鉄 道」作 品集 二》	東京	緑蔭書 房	2007・ 2	350			
50	〈宣誓詩 臺 灣兵制史邁 向強者之 路〉（〈宣 誓詩 台湾兵 制史つはも のへの 途〉）	《青年 演劇脚 本集》 第二輯	台北	清水書 店	1944・ 3	1-54	戲劇	由日領臺的不穩 到平定各地為發 端，歌頌皇威與 良民的協助，再 歌頌今志願兵前 身之沿革，強調 臺協助日的兵制 有史可考。	吉村 敏・皇 民奉公 會台北 州支部 藝能指 導部編 ／皇民 奉公會 台北州 支部撰
		收入河 原功編 《台湾 戯曲・ 脚本集 三》	東京	緑蔭書 房	2003・ 2	237- 290			
51	〈農夫志 願〉（〈百 姓志願〉）	《青年 演劇脚 本集》 第二輯	台北	清水書 店	1944・ 3	215- 266	戲劇	以臺灣農村青年 為主角，旨在培 養認真看待徵兵 制的農村青年與 理解徵兵制的老 年層身影之皇民 鍊成劇。	吉村 敏・皇 民奉公 會台北 州支部 藝能指 導部編 ／皇民 奉公會 台北州 支部撰
		收入河 原功編 《台湾 戯曲・ 脚本集 三》	東京	緑蔭書 房	2003・ 2	451- 502			
52	〈街頭小説 鐵路〉 （〈辻小説 鐵路〉）	《いし ずゑ》4 月号		台湾鉄 道協会	1944・ 5・15	22	小説	透過平交道旁一 位父親曉子以火 車與鐵軌宛若前 線戰士與後方百 姓之大義，強調 後方支援的重要 。	吉村敏
		收入中 島利郎 編 《「台 湾鉄 道」作 品集 二》	東京	緑蔭書 房	2007・ 2	351			
53	〈劇作家， 奮起吧！〉 （〈劇作家 よとも に〉）	《台湾 文芸》1 巻2号	台北	台湾文 学奉公 会	1944・ 8	9	隨筆	強調藝能奉公團 宛若臺灣要塞砲 台，所發射子彈 將撼動臺灣島民 魂魄使其心靈也 要塞化。此刻劇 文學從事者使命	吉村敏
		收入中 島利郎 等編 《日本	東京	緑蔭書 房	2001・ 4	277			



		統治期 台湾文学 芸論集》五 卷						重大，當應總蹶 起而致力精進於 此道。	
54	〈從築城現場 歸來〉 （〈築城現場 より帰つて〉）	《台湾 文学芸》1 卷4号 收入中 島利郎・河 原功・下 村作郎編 ，《日本 統治期 台湾文学 芸論集》第 五卷	台北 東京	台湾文学 奉公会 綠蔭書 房	1944・ 8 2001・ 4	73- 74 283- 284	隨 筆	表達身為派遣奉 公作家的喜悅與 將要塞化臺灣樣 貌以文學呈現的 任務備感榮譽之 情，也表達戰時 下從事文學的幸福 感，並提及在 南方與徵用文學 作家尾崎士郎與 火野（葦平）交 會時，從中習得 的奉公精神。	吉村敏
55	〈清純〉 （原文同）	《台湾 新報・青 年版》98 号 收入中 島利郎編 ，《「台 湾新報・青 年版」作 品集》	台北 東京	台湾新 報社 綠蔭書 房	1944・ 8・22 2007・ 2	未 可 知 329- 332	小 說	透過南方商事庶 務係的男上司慰 留女下屬時的雙 方對話宣揚職域 奉公；並呈現戰 時下女性渴望職 場平權，能從事 與軍事直接而非 僅間接相關之工 作。	吉村敏
56	〈堅實的後 盾：拜訪山 中勇士遺 族〉（〈た しかな裏づ け：山の勇 士の遺族を 訪ねて〉）	《新建 設》3 卷9号 （通卷 24号）	台北	皇民奉 公会中 央本部	1944 年9月	40- 44	隨 筆	吉村敏以皇奉會 派遣作家身份再 次前進原住民部 落，報導高砂義 勇隊遺族的忠誠 、原住民母親的 奉公美談與 「理蕃」成效及 日警的辛勞。	吉村敏 （皇奉 派遣作 家）
57	〈築城之 抄〉（〈築 城の抄〉）	初出 《台湾 芸術》 9・10 月号 收入台	台北 台	台湾芸 術社 台湾出	1944・ 9/10 1944・	不 明 123-	小 說	以主角忠平的角度 報導「公用地」 （地點不明） 「築城戰士」職 域奉公的身影。 記錄混齡	吉村敏

		台湾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湾小説集（乾の巻）》	北	版文化株式会社	12	155		臺灣男女工人在建築現場戮力勞動的身影，其間並鑲入以天子之國日本為頂點之言說。並透過築城周邊如移民村老人愛土愛臺及農業勞動之書寫，報導要塞化臺灣「農業戰士」奉公身影。	
		收入台湾總督府情報課編，河原功監修，《決戰台湾小説集乾之卷／之坤卷》	東京	ゆまに書房	2000・9	123-155			
58	〈街頭小説鐵石之志〉（〈辻小説鐵石の志〉）	《台湾新報・青年版》147号	台北	台湾新報社	1944・10・18	未可知	小説	引南北朝武將小楠公與其母的故事，書寫未通過少年飛行兵考試欲自殺遭母力阻，一年後終因意志堅定而合格，母遂將合格通知書供奉佛壇祭父的故事。	吉村敏
		收入中島利郎編，《「台湾新報・青年版」作品集》	東京	綠蔭書房	2007・2	406			
59	〈柚子樹〉（〈ザボンの木〉）	《少国民文化》十二月号	東京	財団法人日本少国民文化協会	1944・11・1	24-27	小説	以臺籍張家祖孫對話導出爺爺曾參與明治三十年「護鄉兵」與日「討伐土匪」事蹟，曉諭臺人在徵兵制中接棒；並營造孫輩渴望追隨長輩從軍意象。另並說明志願兵名稱沿革，主張其乃有史可考。題名來自張家以架設於家中柚樹上的竹製單槓健身之情節，具孕育志願兵的支柱之意象。	吉村敏

60	〈給勤勞青年的十分鐘演劇脚本友情命令一幕〉（〈勤勞青年のための十分間演劇脚本友情命令一幕〉）	《台湾新報・青年版》163号	台北	台湾新報社	1944・11・5	未可知	戲劇	未可知。（參照中島利郎編，中島利郎編，《「台湾新報・青年版」作品集・『台湾新報・青年版』文芸關係目錄》，東京，綠蔭書房，2007年2月，483頁。）	吉村敏
61	〈街頭小說某個矛盾〉（〈辻小説ある矛盾〉）	《台湾文芸》1卷6号	台北	台湾文学奉公会	1944・12	33	小説	描寫戰時下日本人一家躲防空洞的「非日常」的「日常」生活景觀。	吉村敏
62	《一顆飛彈》（《一つの矢彈》）	單行本 收入中島利郎編，《台湾戯曲・脚本集四》	台北 東京	台湾芸術社 綠蔭書房	1944・12 2003・2	1-214 173-386	戲劇	藝能奉公團上演青年劇脚本集。響應日仇視英美立場，以六篇城鄉與造船等場景中改姓名臺人及志願兵等日臺人對話，書寫各地各職域奉公的日臺人身影。	吉村敏
63	〈庁内随記(4)〉（原文同）	《和歌山県民の友》23号	和歌山市	和歌山県庁秘書課	1948・7・1	2	隨筆	主張文化課(日語讀音為 Bunkaka)的職員不應悖離民眾，應扮演像菲國 Bunkaka 的伴奏樂器之角色，搭起文化機構與民眾之間的橋樑。	吉村守
64	《昭和紀伊洪浪記》（《昭和紀伊洪浪の記》）	單行本	和歌山市	同胞援護会和歌山県支部	1948・7・15	219頁	記錄	「昭和南海地震」震災記錄	吉村守（編）

說明：1.本表中的吉村敏作品名稱中譯為筆者自譯。

2.有關序號 64《昭和紀伊洪浪記》一書的發行機構，其中「同胞援護會」為戰後初期的 1946 年 3 月-1951 年 2 月間存在於日本的社福團體，協助包括戰歿軍人及其遺族、受傷軍人及其家族、戰災者、以及從日本舊殖民地撤退回日本本土者。參照日本維基百科（ウィキペディア）「同胞援護會」項，<http://ja.m.wikipedia.org/wiki/同胞援護會>

## 引用書目

## 近人文獻

- 二見直三 HUTAMI, Naozō  
 1937 〈非常時と理蕃〉，《理蕃の友》61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7年1月），頁2。  
 “Hizyōzi to Riban,” *Riban no Tomo* No.61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7), p.2.
- 山中恒 YAMANAKA, Hisashi  
 1978 《児童読物よ、よみがえれ》（東京：晶文社，1978年），頁64-70。  
*Zidōyomimono yo, Yomigaere* (Tokyo: Shobunsha, 1978), pp.64-70.
- 山中樵 YAMANAKA, Kikori  
 1932 〈山の子供達〉，《理蕃の友》3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2年3月），頁3-4。  
 “Yama no Kodomotachi,” *Riban no Tomo* No.3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 pp.3-4.
- 上田光輝 UEDA, Kōki  
 1939 《皇民讀本》（基隆：浄土宗青年聯盟，1939年），頁1-2、6。  
*Kōmin Tokuhon* (Keelung: Zyōdosyū Seinen Renmei, 1939), pp.1-2,6.
- 大石茂雄 ŌISHI, Shigeo  
 1940 〈山地高砂族教育教化に就て〉，《理蕃の友》100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40年4月），頁9。  
 “Sanchi Takasagozoku Kyōiku Kyōka nitsuite,” *Riban no Tomo*, No.100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0), p.9.  
 1941 〈先づ神道を〉，《理蕃の友》117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41年9月），頁2。  
 “Mazu Shindo o,” *Riban no Tomo*, No.117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1), p.2.
- 下村作次郎 SHIMOMURA, Sakujirou  
 2002 〈日本から逆輸入された『サヨンの鐘』の物語——中央舞台の台湾上演と呉漫沙の『サヨンの鐘』〉，收入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恵（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185。

“Nihon kara Gyaku Yunyūsareta Sayon no Kane no Monogatari”: Chyūō Butai no Taiwan Zyōen to WU, Mansha no Sayon no Kane,” in FUJII, Shozo, HUANG Yingche, TARUMI Chie (eds.) *Taiwan no Daitōa Sensō: Bungaku, Media, Bunka*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02) ,p.185.

土屋一郎 TSUCHIYA, Ichirō

1940 〈理蕃機構の綜合的性格と教育〉，《理蕃の友》105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40年9月），頁3-4。

“Riban Kikō no Sōgōteki Seikaku to Kyōiku,” *Riban no Tomo*, No.105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0) ,pp.3-4.

井上英 INOUE, Ei

1932 〈理蕃の友に題す〉，《理蕃の友》創刊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2年1月），頁2。

“Riban no Tomo ni Daisu,” *Riban no Tomo*, No.1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 ,p.2.

升井生 MASUISEI

1931 〈警察官の転勤を論ず〉，《台湾警察時報》32号（台北：台湾総督府警務局内台湾警察協会，1931年5月），頁4。

“Keisatsukan no Tenkin o Ronzu,”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32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eimukyoku Na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31) ,p.4.

中山侑 NAKAYAMA, Susumu

1941 〈風——ある蕃地の駐在所風景——〉，《台湾警察時報》303号（台北：台湾総督府警務局内台湾警察協会，1941年2月），頁95-99。

“Kaze: Aru Banchi no Chūzaisho Fūkei,”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303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eimukyoku Na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41) ,pp.95-99.

中山清 NAKAYAMA, Kiyoshi

1935 〈青年団幹部懇談会に出席して〉，《理蕃の友》48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5年12月），頁8-9。

“Seinendan Kanbu Kondankai ni Shussekishite,” *Riban no Tomo* No.48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5) ,pp.8-9.

中研院臺史所（藏）

臺灣總督府職員録系統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1944 〈吉村敏所寄信函〉，1944年6月24日、1944年6月29日，〈楊雲萍文書〉。〈吉村敏所寄名信片〉1944年4月18日、

1944年5月3日、1944年7月29日，《楊雲萍文書》。

“Ji Tsun Min Suo Ji Shin Han: 24., Jun., 1944, 29., Jun., 1944,” in YANG, *Yunping Wenshu*, “Ji Tsun Min Suo Ji Min Shin Pian: 18., Apr., 1944, 3., May., 1944, 29., July., 1944,” in YANG, *Yunping Wenshu*.

中島利郎 NAKAJIMA, Toshio

2002 〈『決戦台湾小説集』の刊行と西川満〉，收入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恵（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85、87。  
“Kessen Taiwan Shōsetsushū no Kankō to Nishikawa Mitsuru,” in FUJII, Shozo, HUANG Yingche, TARUMI Chie (eds.) ,*Taiwan no Daitōa Sensō: Bungaku, Media, Bunka*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02) ,pp.85, 87.

2003 （編著）《台湾戯曲・脚本集四・解説》（東京：緑蔭書房，2003年），頁393-398。  
（eds.）*Taiwan Gikyoku Kyakuhonshū No.4: Kaisetsu* (Tokyo: Ryokuin Shobo, 2003) ,pp.393-398.

2004 《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序説・台湾総督府情報課編『決戦台湾小説集 乾之巻／坤之巻』の刊行——「台湾決戦文学会議」から『決戦台湾小説集』へ》（東京：緑蔭書房，2004年），頁204-233。  
*Nihon Tōchiki Taiwan Bungaku Kenkyū Josetsu, Taiwan Sōtokufu Jōhoka Hen Kessen Taiwan Shōsetsushū Ken no Maki, Kon no Maki no Kankō: Taiwan Kessen Bungaku Kaigi kara Kessen Taiwan Shōsetsushū e* (Tokyo: Ryokuin Shobo, 2004) ,pp.204-233.

石垣警務局長 ISHIGAKI (Keimukyokuchō)

1935 〈高砂族青年団幹部懇談会に於ける石垣警務局長訓示〉，  
《理蕃の友》47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5年11月），  
頁1。  
“Takasagozoku Seinendan Kanbu Kondankai niokeru Ishigaki Keimukyokuchō Kunji,” *Riban no Tomo No.47*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5) ,p.1.

矢野峰人 YANO, Hōjin

1944 〈序〉，收入台湾総督府情報課（編）：《決戦台湾小説集》（乾の巻）（台北：台湾出版文化株式会社，1944年12月），  
頁3。  
“Jo,” in Taiwan Sōtokufu Jōhoka (eds.) , *Kessen Taiwan Shōsetsushū Ken no Maki*, (Taipei: Taiwan Syuppan Bunka Kabusikigaisya, 1944) ,p.3.

台北州理蕃課 TAIPEISHU, Ribanka

- 1932 〈台北州理蕃課発行の學術講習用蕃語資料に就て〉，《理蕃の友》4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2年4月），頁10。  
 “Taipeishu Ribanka Hakkō no Gakujutsu Kōshūyō Bango Shiryō nits“ite,”*Riban no Tomo* No.4（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p.10.

台湾總督府（編） Taiwan Sōtokufu（eds.）

- 1915 《佐久間台湾總督治績概要》（台北：台湾總督府，1915年），頁101-102。  
*Sakuma Taiwan Sōtoku Chiseki Gaiyō*（Taipei: Taiwan Sōtokufu, 1915）,pp.101-102.

台湾總督府警務局 Taiwan Sōtokufu Keimukyoku

- 1941 〈内本鹿ブヌン族の兇行〉，《理蕃の友》112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41年4月），頁3。  
 “Laipunuk Bununzoku no Kyōkō,” *Riban no Tomo* No.112（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1）,p.3.  
 1942 《高砂族の教育》（台北：台湾總督府警務局，1942年），頁8、15-16、97、100、109。  
*Takasagozoku no Kyōiku*（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eimukyoku, 1942）,pp.8, 15-16, 97, 100, 109.

台湾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Taiwan Sōtokufu Keimukyoku Ribanka

- 1935 〈理蕃大綱〉，《理蕃概況》（台北：台湾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5年），頁1-2。  
 “Riban Taikō,” *Riban Gaikyō*（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eimukyoku Ribanka, 1935）,pp.1-2.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 Taiwan Zongdufu Jingcha Benshu（eds.）

- 1997a 〈樺山總督於琉球中城灣之諭示中有關撫綏原住民之要旨〉，《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陳金田（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5。  
 “Huashan Zongdu Yu Liouciou Jhongchengwan Jhih Yushih Jhong Youguan Fusuei Yuanjhumín Jhih Yaojhih,” *Rihjyushihci Yuanjhumín singhengjihgao* Vol.1, Jintian Chen（trans.）（Nantou: Taiwan Sheng Wunsian Weiyuanhuei, 1997）,P.5.  
 1997b 〈呈請設立撫墾署〉，〈撫墾署官制〉，〈訂定原住民語編纂方針〉，《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陳金田（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9-10、40-41。  
 “Chengcing Sheli Fukenshu,”” Fukenshu Guanjihih,”” Dingding Yuanjhuminyu Bianzuan Fangjhen, ” *Rihjyushihci Yuanjhumín*

- Singhengjihgao* Vol.1, Jintian Chen ( trans. ) ( Nantou: Taiwan Sheng Wunsian Weiyuanhui,1997 ) ,pp.9-10.
- 1997c 〈總督在警察會員上之訓示〉，《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四卷》，陳金田（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12。
- “Zongdu Zai Jingcha Hueiyuan Shang Jih Syunshih,” *Rihjyushihci Yuanjumin Singhengjihgao* Vol.4, Jintian Chen ( trans. ) ( Nantou: Taiwan Sheng Wunsian Weiyuanhui,1997 ) ,P.12.
- 江口良三郎 EGUCHI, Ryozaiburō
- 1917 〈蕃人の接遇と民蕃接触取締方〉，《台湾警察協會雜誌》1号（台北：台湾警察協會，1917年6月），頁23。
- “Banjin no Setsugū to Minban Sesshoku Torishimarikata,”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Zasshi* No.1 ( Taipe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17 ) , P.23.
- 竹中信子 TAKENAKA, Nobuko
- 2009 《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 1926-1945）上》，熊凱弟（譯）（臺北：時報出版，2009年），頁239-241、280-281。
- Rihjih Taiwan Shenghuoshih: Rihben Nyuren Zai Taiwan (Jhao he Pian 1926-1945)* , K aidi Syong ( trans. ) ( Taipei: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2009 ) ,pp.239-241,280-281.
- 吉村守・堀川安市 YOSHIMURA, Mamoru, HORIKAWA, Yasuichi
- 1941 〈台湾の志願兵制について〉，頁14。
- “Taiwan no Shiganheisei nitsuite,” , p.14.
- 吉村敏 YOSHIMURA, Satoshi
- 1934 〈台湾農村公学校児童の生活〉，頁60。
- “Taiwan Nōson Kōgakkō Jidō no Seikatsu,” , p.60.
- 1939 〈隨想『兒童街』〉，頁9。
- “Zuisō Jidōgai,” *Jidōgai*, p.9.
- 1940 〈子供は総て〉，頁79-81。
- “Kodomo wa Subete,” , pp.79-81.
- 1941a 〈悲運の鄭氏〉，頁102。
- “Hiun no Tei Shi,” , p.102.
- 1941b 〈親馬鹿〉，頁74。
- “Oyabaka,” , p.74.
- 1942 〈見た比律賓人〉，頁38。
- “Mita Hirippinjin,” ,p.38.
- 1943a 〈ヒリッピン古楽器図誌(3)〉，頁29。



- “Hirippin Kogakki Zushi (3)”, p.29.
- 1943b 〈比島遊記 サンバギータ〉, 頁 113。  
“Hitō Yūki: Sanpagiita,” p.113.
- 1943c 《護郷兵：〈はしがき〉》, 頁 5。  
*Gokyōhei: Hashigaki*, p.5.
- 1944 〈ザボンの木〉, 頁 24-27。  
“Zabon no Ki,” pp.24-27.
- 1948 〈庁内随記(4)〉, 頁 2。  
“Chōnai Zuiki (4),” p.2
- 2001 〈築城現地より帰って〉, 頁 283-284。  
“Chikujō Genchi yori Kaette,” pp.283-284.
- 2002 〈山路〉, 頁 175-187。  
“Mountain Road,” pp.175-187.
- 灰面坊 HAIMENBŌ
- 1930 〈警察の民衆化〉, 《台湾警察時報》3 号 (台北：台湾警察協会, 1930 年), 頁 5。  
“Keisatsu no Minshūka,”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3 (Taipe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30) ,p.5.
- 辻信治 TSUJI, Shinji
- 1942 〈教育先行〉, 《理蕃の友》125 号 (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 1942 年 5 月), 頁 4。  
“Kyōiku Senkō,” *Riban no Tomo* No.125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2) ,p.4.
- 行徳子 GYŌTOKU, Ko
- 1941 〈—駐在所風景—或る妻の日記〉, 《台湾警察時報》302 号 (台北：台湾総督府警務局内台湾警察協会, 1941 年 1 月), 頁 108-110。  
“Chuzai-sho Fukei: Aru Tsuma no Nikki,”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302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eimukyoku Na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41) ,pp.108-110.
- 寺奥徳三郎 TERAOKU, Tokusaburō
- 2000 〈日本殖民統治下之「高雄叛亂事件」／代譯序〉, 《臺灣特高警察物語》(財), 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 (臺北, 文英堂出版社, 2000 年), 頁 3-4。  
“Rihben Jihmin Tongjhi Hsia Jih Gaosyong Panluan Shih jian Daiyi Syu,” in *Taiwan Tegao Jingcha Wuyu*, (Tsai) Rihben Wenjiao Jijinhui (trans.) (Taipei: Wen Ying Tang Publishing Co., Ltd, 2000) , pp.3-4.

志能 SHINO

- 1941 〈卷頭言〉，《台灣警察時報》312 号（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41 年 11 月），頁 1。  
 “Kantōgen,”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312 (Taipe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41) ,p.1.

松田京子 MATSUDA, Kyōko

- 2003 〈台灣原住民の法的地位からみた原住民政策の展開——植民地統治初期を中心に——〉，《台灣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 年 3 月），頁 190。  
 “Taiwan Genjūmin no Hōteki Ichi kara Mita Genjūmin Seisaku no Tenkai: Shokuminchi Tōchi Shoki o Chūshin ni,” in *Taiwan no Kindai to Nihon* (Nagoya: Chukyo Daigaku Shakai Kagaku Kenkyujo, 2003) , p.190.

松本確 MATSUMOTO, Akira

- 1932 〈蔬菜の害虫駆除剤に就て〉，《理蕃の友》5 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2 年 5 月），頁 7。  
 “Sosai no Gaichūkujozai nitsuite,” *Riban no Tomo* No.5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 ,p.7.

周婉窈（主編） CHOU, Wanyao (eds.)

- 1997 《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頁 14。  
*Taiji Rihbenbing Zuotanhuei Jilu Bing Siangguan Zihliao* (Taipei:Jhongyang Yanjiouyuan Taiwanshih Yanjiuousuo Chou beichu,1997) , p.14.  
 1999 《臺灣歷史圖說》（臺北：聯經出版，1999 年），頁 169。  
*Taiwan Lishih Tushuo* (Taipei: Linkingbooks, 1999) , p.169.

長野晃子 NAGANO, Akiko

- 2000 〈義理は日本文化に固有のものか〉，《東洋大学社会学部紀要》38 卷 1 號（東京：東洋大学社会学部，2000 年 12 月），頁 55-74。  
 “Giri Wa Nihon Bunka ni Koyū no mono ka,” *Tōyō Daigaku Shakai Gakubu Kiyō* Vol.38 No.1 (Tokyo: Toyo Daigaku Shakai Gakubu, 2000) ,pp.55-74.

林慧君 LIN, Huijun

- 2012 〈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的原住民形象〉，《國文天地》28 卷 3 期（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2012 年 8 月），頁 58-64。  
 “Rihjyushihci Zaitai Rihren Siaoshuo de Yuanjhumín Sing siang,” *Guowun Tiandi* Vol.28, No.3 (Taipei: Guowun Tiandi Zajhihshe ,

- 2012), pp.58-64.
- 近藤正己 KONDO, Masami  
 1988 〈異民族に対する軍事動員と皇民化政策——台湾の軍夫を中心にして——〉, 台湾近現代史研究会編：《台湾近現代史研究》（東京：緑蔭書房，1988年），頁148-150、150-152、163。  
 “Iminzoku ni Taisuru Gunji Dōin to Kōminka Seisaku:Taiwan no Gunfu o Chūshin ni Shite,”in *Taiwan Kingendaishi Kenkyu*, Taiwan Kingendaishi Kenkyūkai (eds.) (Tokyo: Ryokuin Shobo,1988), pp. 148-150,150-152,163.
- 春山明哲 HARUYAMA, Meitetsu  
 1978 〈昭和政治史における霧社事件——植民地統治の政治過程分析——〉, 《台湾近現代史研究》創刊号（東京：台湾近現代史研究会，1978年4月），頁121。  
 “Shōwa Seijishi niokeru Mushajiken: Shokuminchi Tōchi no Seichi Katei Bunseki,” *Taiwan Kingendaishi Kenkyu*, No.1 (Tokyo: Taiwan Kingendaishi Kenkyūkai, 1978), p.121.
- 垂水千恵 TARUMI, Chie  
 2002 〈あとがき〉, 收入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恵（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311-312。  
 “Atogaki”,in FUJII, Shozo, HUANG Yingche, TARUMI Chie (eds.), *Taiwan no Daitōa Sensō: Bungaku, Media, Bunka*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02), pp.311-312.
- 2003 〈一九四〇年代の台湾文学——雑誌『文芸台湾』と『台湾文学』〉, 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湾文学》（東京：国書刊行会，2003年），頁128-129。  
 “Senkyūhyakuyonjū Nendai no Taiwan Bungaku: Zasshi *Bungei Taiwan to Taiwan Bungaku*,”in *Kōza: Taiwan Bungaku*, Yamaguchi Mamoru (eds.) (Tokyo: Kokusho Kankōkai,2003), pp.128-129.
- 星名宏修 HOSHINA, Hironobu  
 2002 〈《台湾純文学集二》日本人作家作品解説〉, 《台湾純文学集二》（東京：緑蔭書房，2002年），頁489-498。  
 “*Taiwan Junbungakushū* Vol.2: Nihonjin Sakka Sakuhin Kaisetsu,” in *Taiwan Junbungakushū* Vol.2 (Tokyo: Ryokuin Shobo, 2002), pp.489-498.
- 保羅・D・巴克萊 Paul D. Barclay  
 2020 《帝國棄民》, 堯嘉寧（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頁366。

*Diguo Cimin [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 Yao, Chianing (trans.), p.366.

宮川加津江 MIYAGAWA, Katsue

1938 〈蕃地居住の一女性として〉，《理蕃の友》83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8年11月），頁5。

“Banchi Kyojū no Ichijosei toshite,” *Riban no Tomo* No.5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 p.7.

荊子馨 CHING, Leo

2006 《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219。

*Chengwei Ribenren: Zhimindi Taiwan yu Rentong Zhengzhi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Li-hsuan Cheng (trans.)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6), p.219.

宮尾五郎 MIYAO Gorō

1939 〈理蕃事業は皇道日本の誇〉，《理蕃の友》85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9年1月），頁2。

“Riban Jigyō wa Kōdō Nihon no Hokori,” *Riban no Tomo* No.85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9), p.2.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94 《民意——沉默螺旋的發現之旅》，翁秀琪等（譯）（臺北：遠流出版，1994年），頁15-24。

*Minyi: Chenmo Luosyuan de Fasian Jih Lyu*, Weng, Shieu-chi (trans.)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4), pp.15-24.

高橋生 TAKAHASHISEI

1939 〈油断大敵〉，《理蕃の友》85号，頁2。

“Yudan Taiteki,” *Riban no Tomo* No.85, p.2.

莊永清 JHUANG, Yongcing

2012 〈日治時代臺南新文學史料的歷史考察〉，收入葉瓊霞等：《文學臺南——臺南文學的特展圖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141。

“Rihjih Shihdai Tainan Sinwunsyue Shihliao de Lishih Kao cha,” in *Wunsyue Tainan: Tainan Wunsyue de Tejhan Tujih*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2012), p.141.

理蕃の友発行所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a 〈蕃語研究熱の勃興と希望〉，《理蕃の友》3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2年3月），頁10。

- “Bango Kenkyūnetsu no Bokkō to Kibō,” *Riban no Tomo* No.3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 ,p.10.
- 1932b 〈新來理蕃人の悩〉，《理蕃の友》12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年12月），頁5。  
 “Shinrai Ribanjin no Nayami,” *Riban no Tomo* No.12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 ,p.5.
- 1937a 〈時局と理蕃人の覚悟〉，《理蕃の友》68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7年8月），頁1。  
 “Jikyoku to Ribanjin no Kakugo,” *Riban no Tomo* No.68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7) ,p.1.
- 1937b 〈高砂族の文化〉，《理蕃の友》72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7年12月），頁1。  
 “Takasagozoku no Bunka,” *Riban no Tomo* No.72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7) ,p.1.
- 1939 〈長期建設と理蕃〉，《理蕃の友》85号，頁1。  
 “Chōki Kensetsu to Riban,” *Riban no Tomo* No.85,p.1.
- 1941a 〈總務長官訓示（理蕃關係抜粹）昭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於警察會議〉，《理蕃の友》114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6月），頁1。  
 “Sōmu Chōkan Kunji (Riban Kankei Bassui) Shōwa Jūroku Nen Go Gatsu Hatsuka Keisatsu Kaigi nite,” *Riban no Tomo* No.114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1) ,p.1.
- 1941b 〈警務局長訓示：昭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於理蕃事務打合會〉，《理蕃の友》114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年6月），頁2。  
 “Keimukyokuchō Kunji: Shōwa Jūroku Nen Go Gatsu Nijūku Nichi Riban Jimu Uchiawasekai nite,” *Riban no Tomo* No.114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1) ,p.2.
- 1941c 〈愛国少女サヨンの鐘〉，《理蕃の友》117号，頁5。  
 “Aikoku Shōjo Sayon no Kane,” *Riban no Tomo* No.117,p.5.
- 藤井志津枝 FUJII, Shizue
- 1989 《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9年），頁2、236。  
*Rihjyu Chuci Taiwan Zongdufu de Lifan Jhengce* (Taipei: Guoli Taiwan Shihfan Dasyue Lishih Yanjiuousuo, 1989) , pp.2, 236.
- 2007 〈臺灣高砂義勇隊是「志願」還是「強擄」？〉。  
<https://groups.google.com/g/youtu/c/t8oRGQyQI7c?pli=1>  
 “Taiwan Gaosha Yiyongduei Shih Jhihyuan Haishih Cianglu?,”  
<https://groups.google.com/g/youtu/c/t8oRGQyQI7c?pli=1>

- 2010 <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出發前夕の臺灣——1940年日軍南進的系譜>，收入《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頁260。  
 “Di Yi Hwei Gaosha Yiyongduei Chufa Ciansi de Taiwan:1940 Nian Rihjyun Nanjin de Sipu,” in *Rihjyu Shih ci Taiwan Jhinhmindishih Syueshu Yantaohuei Lunwunji*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10), p.260.
- 鈴木宗憲 SUZUKI, Shūken  
 1964 《日本の近代化と「恩」の思想》（京都：法律文化社，1964年），頁32-33、42-43、45-46。  
*Nihon no Kindaika to On no Shisō* (Kyoto:Horitsubunkasha,1964), pp.32-33, 42-43, 45-46.
- 鈴木重雄 SUZUKI, Shigeo  
 1942 《日本精神史要論》（東京：理想社，1942年），頁323-324、353-363。  
*Nihon Seishinshi Yōron* (Tokyo:Risosya,1942), pp.323-324, 353-363.
- 鈴木質 SUZUKI, Tadashi  
 1930 <教育所の訓練四>，《台湾警察時報》6号（台北：台湾警察協會，1930年），頁23-24。  
 “Kyōikusho no Kunren Yon,”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6 (Taipe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30), pp.23-24.
- 1932 <蕃童教育の二大眼目>，《理蕃の友》創刊号（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年），頁6-7。  
 “Bandō Kyōiku no Nidai Ganmoku,” *Riban no Tomo* No.1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2), pp.6-7.
- 葉石濤 YE, Shihtao  
 1990 《臺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年），頁19、21-22。  
*Taiwan Wunsyue de Beicing* (Kaohsiung:Paise Wunhua Chubanshe, 1990), pp.19, 21-22.
- 新竹X生 SHINCHIKU, Ekusesei  
 1941 <ある巡查の生活記録>，《台湾警察時報》302号（台北：台湾警察協會，1941年1月），頁112。  
 “Aru Junsu no Seikatsu Kiroku,”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302 (Taipe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41), p.112.
- 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 SHINCHIKUSHUJIHO, Hakkoiinkai  
 1937 <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事項>，《新竹州時報》（新竹：新

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1937年12月），頁39-41。

“Kokumin Seishin Sōdōin Jisshi Jikō,” *Shinchikushu Jiho* (Shinchiku: Shinchiku Jihō Hakkō Iinkai, 1937), pp.39-41.

福岡一市民 FUKUOKA, Ichishimin

1941 〈サヨンの篤行に痛く：感激した福岡市民の手紙〉，《理蕃の友》120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41年12月），頁7。

“Sayon no Tokkō ni Itaku: Kangekishita Fukuoka Shimin no Tegami,” *Riban no Tomo* No.120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1), p.7.

翠巒生 SUIRANSEI

1930 〈蕃地勤務者の不平を聴け〉，《台湾警察時報》10号（台北：台湾警察協會，1930年5月），頁8。

“Banchi Kinmusha no Fuhei o Kike,”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10 (Taipei: Taiwan Keisatsu Kyōkai, 1930), p.8.

劉宇衛 (Valentin Golovachev)、莫洛賈科夫 (Vassily Molodyakov)

2018 《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文史料與研究》，陳韻聿（譯）（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年），頁107-108, 111。  
*Rihben Tongjih Shihdai de Taiwan: Ewun Shihliao yu Yanjiou*, Chen, Yunyu (trans.) (Taipei: Jhongyang Yanjiouyuan Taiwanshih Yanjiusuo, 2018), pp.107-108, 111.

横尾廣輔 YOKOO, Hirosuke

1935 〈博覽会の観光と其の指導教化〉，《理蕃の友》48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35年12月），頁2-3。

“Hakurankai no Kankō to Sono Shidō Kyōka,” *Riban no Tomo* No.48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35), pp.2-3.

篠原哲次郎 (編) SHINOHARA, Tetsuzirō (eds.)

1940 〈全島警察官疾病調 邦家の為に健康を保て〉，《台湾警察時報》301号（台北：篠原哲次郎發行，1940年12月），頁117。

“Zentō Keisatsukan Shippeicho Hōka no Tame ni Kenkō o Tamote,” *Taiwan Keisatsu Jihō* No.301 (Taipei: Shinohara, Tetsuziro, 1940), p.117.

齊藤生 SAITŌSEI

1941a 〈蕃地の皇民奉公運動〉，《理蕃の友》117号，頁1-2。

“Banchi no Kōmin Hōkō Undō,” *Riban no Tomo* No.117, pp.1-2.

1941b 〈編輯余録〉，《理蕃の友》119号（台北：理蕃の友発行所，1941年11月），頁10。

“Henshū Yoroku,” *Riban no Tomo* No.119 ( Taipei: Riban no Tomo Hakkōjo, 1941 ) , p.10.

塩月桃甫

SHIOTSUKI, Tōho

1942

〈表紙絵解説〉，《皇国の道》第一号（台北：台湾総督府文教局学務課，1942年6月），頁71。

“Hyōshie Kaisetsu,” *Kōkoku no Michi* No.1 (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Bunkyoōkyoku Gakumuka, 1942 ) , p.71.